

立场 - 教育对话

POSITIONS: Dialogues on Education

i	刊首语	
1	大环境的突破是等不来的 ——西部阳光在甘肃	梁晓燕
14	象牙塔与泥巴墙（上） ——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农民培训反思	潘家恩
29	西部支教日记（四）	周忆粟
43	我心中的奥运	京华觅客
52	主题征稿启事	

版权说明：本杂志采用 CC 版权（Creative Commons）知识共享协议
“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禁止演绎 3.0 Unported”



刊首语

春节将至,《立场》编辑小组首先向大家恭贺新春,祝大家万事胜意,虎年吉祥!不知不觉中,《立场》已经走过了两个年头,一路行来,尽管磕磕绊绊难免,我们还是很欣慰这份小小的杂志一直坚持了下来。让我们也祝愿《立场》借着虎年的开年威风,虎虎有生气。

上期我们介绍的乡村教育促进会(RCEF)引来不少读者,尤其是一些从事教育NGO的同行们的热烈反馈。这一期我们向大家介绍另一个专业服务于西部农村教育的非公募基金会,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基金会的“西部阳光行动”乡村志愿服务项目。作者梁晓燕长期实地考察农村教育,对贫困地区农村教育的现状有比较清晰的认识。结合当地教师高流动性、教材和现实的脱节、资源分配不均衡等等实际状况,她带领“西部阳光行动”因地制宜进行培训教师以及家长的项目,读来颇多可供借鉴、思考之处。而梁本人对“西部阳光”具体运作的介绍,以及她对国内教育NGO现状的评介更让我们看到了行动者们的决心及其在改善农村教育上有所为的蓬勃希望。因此,我们给这篇从《立场》对梁晓燕的访谈改编而来的文章,加上了一个励志的标题:“大环境”的突破是等不来的。

关键在于行动。潘家恩对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培训项目的反思也明确提出“行动精神”的主旨,强调“行动”与“研究”之相辅相成的关系。这篇文章从乡建中心的实践来回顾、反思教育中最基本的几个问题:教与学的关系、教师与学生的地位、知识所暗含的权力关系等等,试图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民培训,或者说“农民教育”的道路。文章涉及的课题不仅可为教育研究者参考,其中具体的案例分析也为实践、行动者们提供了富含启发意义的实在方法论。

周忆粟的田野札记笔触细致且不乏幽默,常常透出一些试图突破现象的分析和思考,一直受到大家的喜爱。连载至今,本期刊载的已经是他的西部支教日记的另一部分。这里忆粟依然娓娓道出自己的切身经历,读来令人如临其境,与他共同感受着从教育经历折射出来的城乡差距,以及一统式的标准化教育带给大家的无助与无奈。

最后,我们在这一期选登了京华觅客写于北京奥运会期间的一篇散文。作为北京市的“外来人口”,作者通过对奥运会前夕发生在他周围的一桩桩“事件”的关注与表述,从生活的层面为我们讲述了另外一个意义上的“奥运效应”;超越和突破了那抽象的“中国人百年以来的奥运情结”,而是从社会内部的真实来重新理解和建立“我们”与奥运的关系。我们认为,对这种“情结”的超越和突破,于大多数的“国人”来说都是必要的。

新年新气象,新年新希望。《立场》继续诚挚邀请各学科领域的研究者、教育工作者、社会工作者、短期或长期支教人员不吝赐稿。详情见刊后的征稿启事。

《立场》编辑小组

2010年2月12日

大环境的突破是等不来的 ——西部阳光在甘肃

梁晓燕

一、贫困地区农村教育的现状

中国的一个特点是巨大的城乡差别。现在的城乡差别已经在县城水平，就是再贫困的县，县城以上都非常好。因为贫困县的转移支付的力度是不低的，而转移支付的钱，首先就是建设县城。因此现在的城乡差别并不是乡村和大城市的差别，而是县城和乡镇和村庄的差别。县城出去可能5公里、10公里就完全是两个世界，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过去，中国巨大的城乡差别，一部分体现在东部和西部，一些发展地区和不发展地区，一些大城市和小城市。而现在的城乡差别已经体现在每一个县。每一个县的县城和乡镇，基本上都城镇化了，它们与农村，尤其是山区的农村，已经是两个世界。这个问题一定要把它弄清楚。至于教育，再贫困地区的县，都在花大财力打造一两所中学，一两所小学。这两所中学，两所小学，基本上是为县城的干部子女，和县城的吃公家饭的人服务，然后再稍带一些别的人。

西部阳光的前任找到甘肃省教育厅，说我们想找一个贫困县来作为我们工作目标，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于是给我们推荐了一个最差的县，而且说可能也不容易做，可以去试试。结果我们就去了。那个县几乎没有得到过外界的帮助。我们前任去了以后，还是觉得不错，可以带去一些资源。当时是一个前期调研，结果六年级的考试，全县平均分20几分，双科及格率是12%点儿。到底农村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问题到底是什么？都学到啥了？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的程介名教授对农村教育总结了四个问题。第一，学生学到了什么？不是说我们给了学生很多很多的东西，我现在要反过来问，学生拿到了什么得到了东西？第二，被制度筛选淘汰的学生我们给了他们什么？第三，物质资源是关键的吗？第四，学校是在解放学生吗？

我在广西蹲点的学校，2007年六年级班，进校的时候是62个学生，六年级毕业的时候只有12个。少了50个。这是什么比例？这两个月我又去了一次学校，就是2008年毕业的，稍微好一点。我也把数字记下来了，2009年的六年级班是39个人，两年前这个班是57个。2007年辍学特别多，几乎达到80%。现在有30-40%。现在少一点可能是因为不收学费了。

反正不要钱了，就待在学校吧。家长拿学校当托儿所，免得孩子在外面闯祸，那就上学去吧。上学去，到底学到了什么？还有就是学生厌学。学不到什么，从来考试10分20分，你怎么会有兴趣？你永远觉得自己很笨，觉得永远学不好。老师也觉得你这个孩子根本不用心。厌学就是因为教学质量太差了。

公办老师很难在贫困地区留下来工作。甘肃宕昌县特别偏僻，我们去做项目的时候，共有2900名教师，其中500人是代课老师。再多的公办老师派下来都不想到那儿去。很多公办的老师是不稳定的，很多老师的职业是自由的，他分去之后看环境差了可以不要这个职业，他连报到都不去。很多公办老师都这样，一转身，又没了，又要临时去找代课老师。代课老师上了一段，说不行，又给弄掉，又来一个。一个孩子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他可能换十个八个老师，怎么学习得好？与其这样换，不如把一些稳定的能留住的老师好好培训一下。

真留得住的是代课老师，要承认这个现实。本地老师，本村的老师，他跟孩子们有感情。还有一点，他没有更多的期望可以跑到哪里去，因为他没有花成本。你知道出去上大学的，都是花了成本的；经济学的道理在这里一样通行的。代课老师为什么能够留下来呢？他没有花成本，收益和成本的差距不是很大。但是，公办老师是花了几万块钱去上大学，上了大学图什么？花了几万块钱，家里面借了一屁股债，不就是图个跳出农门么？这对他来说这就是一笔帐，你怎么能不算这笔帐呢？对代课老师就不一样，他的帐不是这么算法的。

所以，目前的问题是对于留下来的老师，如何提高他们。他们可以稳定20年，有这20年稳定下来了，这些孩子们也就成材了。有一个代课老师跟我讲过些话，让我觉得很有道理：“虽然他们[公办老师]有大学文凭，但是一个班我们教20个人。[如果]都合并到乡里去，一个班70、80个人。再好的老师分给70、80个学生，你分给每个学生的时间有多少？你怎么可能去照顾那么多的学生？但是我们可以呀。20多个学生我可以对每个学生用心。”教学用心不用心区别可就大了。什么评价教学质量高低、教学水平高低？这些都是因素啊。你去找一个特级教师来，你给他80个人一个班，一个一般的代课老师教20多个人，再看看谁的教学质量高。结果很难说！

我认为，关键的问题是激励这些老师，把劲用在这上面好不好！但我们的行政思维把教师的本科文凭当作成绩。他不花多大力气在代课老师身上，他不是为孩子着想。本科文凭对孩子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孩子就得到了更好的教育了吗？不见得。现在莫名其妙的，把中专全部撤了，只保留师范大学。你以为全部师范大学出来的就是好教师啊？这真是一次对教育的破坏，整个这个决策就是对教育的破坏。本来三级师范教育是中师、高师、师范大学。这三级是应对不同的教师需求，现在变成只有一级（大学）。而这一级的人全部好高骛远，全

部觉得凭什么大学毕业的人要到最底层去。如果是本来的中师学生，他预期就没有那么高，他本来就觉得他该去底层教书。为什么要去破坏这种自然生态呢？

当然也有不那么好的代课老师。但是村民出钱让你来当老师的，一般来说都是很负责，因为乡里乡亲的，天天家长眼睛看着，你就是村里的人，你拿孩子不当一回事，你说不过去的。第二个，因为当老师受尊重，村民们都觉得你在管我的孩子，所以尊重你。尊重对一个人来说和收入是差不多的。当我们将心比心地去体会这个老师的时候，[可以知道]什么样的老师是能够好好的去教学的。不一定本科生不本科生，不一定要拿到多少多少钱。这两项不是不重要，但是还有很多的辅助因素。然而，在我们整个行政体系的考虑当中，所有的辅助因素全都不重要。

还有一点，代课老师这么低的工资，你没有理由对他有要求。工资太不合理了，太不公平了。如果相对提高代课教师工资，即使没有公办老师那么高，我认为也合理。他没有花求学成本，因此他的工资收入有差别也是说得过去的。可是不能这么悬殊，同工虽然不同酬，但差别不能太大。现在的公办老师一般月薪都一千块钱，那么代课老师的工资应该提高到七八百块钱。我在广西时，一般的老师是1500—1800元每月，多的2000元的。而代课老师呢，305块。甘肃这边我们所在的这个县，代课教师205—350元一个月。不过，县里给所有的代课老师上了低保。只要是代课老师，全家人有低保。第二，再根据任课年限，一年增加10块钱，每月工资增加10块钱。那么10年以上的，就可以增加100块钱，有20年的教龄的代课老师就可以增加200块钱。再加上350元，就是550元，550元再加上低保，他们就满足了，我看他就没什么别的要求了。这个县在悄悄地做。因为他们说如果代课老师没有了，[教育]根本就做不下去。

二、农村教师培训农村教师

我们在甘肃宕昌县进行小学校长和教师的培训。我们的培训特色，是让农村的校长和教师来培训农村的校长和教师。有的非政府组织在贵州做农村教师培训，让贵州的特级教师培训农村教师。讲得好吗？他们讲得是很好，但是有两个问题。一是不能持续，不可能永远请特级教师去讲课。第二，农村教师表面虽然不说，心里肯定会想，你们是省城的，是贵阳的，学校各方面条件都好，当然教得好了，心里不服气。所以我们把山东潍坊和甘肃宕昌结队，请潍坊的农村教师去给甘肃的农村教师培训。我们请接受培训的老师们写下感想，他们很多人反映，最大的触动就是这些做培训的教师也是农村教师，他们面临的实际问题跟我们是一

样的。他们的硬件条件好不到哪里去，但他们的精神面貌不一样，软件能力不一样，教学水平不一样。同样是农村教师，为什么人家精神面貌这么好，教学热情这么高，教得这么好？这样，甘肃的教师们觉得没有借口了，没有自我原谅的理由了。

潍坊的教师们平常就有教学研究的要求，挺多老师自己做小课题，自己都在做教改。所以潍坊是全国农村教育搞得最好的地方。其次，教育是一个实践性非常强的领域，一线的教师知道农村学生的学习状况，在什么情况下什么地方学生会碰到什么理解的困难。在培训时，他们就会提到，这个地方会出现什么问题，一般来说我们会用什么方法解决，一二三有几个选择。这些地方，在培训中特别受欢迎。老师们听过最最优秀的大学教授的讲课，听的时候挺激动挺热闹的，很有感觉。听完了，回家睡一觉，就是想不起来了。因为这个东西它是飘忽的，是空中楼阁，扎不到你的生活，扎不到你的教学生涯。而潍坊老师的培训就是实在、有用。有用，又比我们高，比我们确实教得好。所以我们用这种方式来进行教师培训，收到的效果确实好。这个思路在培训的各个层面都一样。

校长：影子培训

我们的校长培训也注重实用。各地很多校长培训都是弄到大学，讲一堆的教育学那套陈词滥调，等于把给大学生讲给一套讲给一线老师听，有的东西显得太高深，有的东西显得太肤浅。他们又不是学生，他们有那么多的经验。但是老实说，对小学尤其是对农村教育没实感的人，根本讲不到他的兴奋点上去。

我们的校长培训是 20 天。前五天的在西北师范大学，给校长做一些理论培训，给一些大的概念，像教育的理念，给一些学校管理是怎么回事等等。当时校长们听了基本上是迷迷糊糊的，也不能说没用，听完了以后，也说不出什么来。理论学习结束，校长们就到潍坊的青州，跟着当地的校长做影子培训。青州选了 15 个学校，甘肃参加培训的有 30 个校长，两个校长在一个学校，就跟着当地的 15 个校长。第一天，校长们先交流，交流还没有进入状况。先交流什么呢？西北师大的老教授给他们培训的时候，抽象出小学的校长容易碰到问题，他们来谈，教授来帮他们总结，然后准备了 7 个问题。7 个问题每个参加培训的校长都要选择一个，作为这次培训重点思考的问题。第一天在青州，15 个当地校长、30 个培训校长先就一般的问题，先大家放开谈，谈完两个人跟一个当地校长回学校。后边十天每天一早就去，当地校长干啥你干啥，就跟着他。

我们在之前对当地校长做过一次培训，跟他们讲怎么才能带好这两位参加培训的校长。

应该在这个十天当中尽量多的安排学校管理的工作。有些工作不会在这十天当中出现，那你要刻意安排它出现。为什么呢？比如说开一个特级教师会。可能你这十天中本来不开的，对不对？要安排一个教师考评，怎么考评；或者是安排一个全校课外学习的一个大的活动。怎么安排这些活动？也就是说这十天中尽量全的把日常工作中的一些事情提前提上来，让甘肃的校长们参加。还有你们的校长和教务主任怎么开会，教务主任怎么排课。所有这些事情，本来不在这十天之内，但是学校管理过程当中都会碰到，那就要安排这样的这种培训。

我们每天晚上带着三个教育学研究生，来做辅导员。每天晚上给参加培训的校长们会。今天看到了什么？什么东西对你有触动？每天晚上开会讨论。第二天再去。就这样子培训，你在那，每天晚上回过来他们来讨论。十五天影子培训结束后，又回到兰州。每个人十五天，把自己考虑的东西，想到的、收获到的、有什么感想谈出来，教授们再帮他们总结。这等于把他们统统教会了，20天。

回到学校以后，每个校长都有一个行动研究课题。回去半年以后，再回来，每个人把自己的课题再总结一次。例如，你专门研究如何调动教师积极性，那么青州学校是怎么做的？我们学校过去怎么做的，在这个过程中我受到什么启发了？回学校试验去，回去做，做了之后你发现了问题，怎么解决？这半年时间还没到，这个总结还没有做。

这些课题都是他们自己命题的。由这么几大块，第一块是关于教师绩效评估，当然是在这个绩效工资出来之前，就是关于教师评估，评价机制。什么是好教师，在学校怎么去评价教师的工作。这是一个大的主题。第二个主题是校园文化和课外兴趣班。兴趣班属于这个范畴但又并不全部纳入文化建设。第三个是学困生转化，就是学习困难的学生提高成绩。第四个是校长管理水平提升，这个选的人很少。选题最多的主要是选择教师激励、教师评价和学困生转化。

他们回去以后，县里面就组织这30个校长，给全县的小学校长做了一场大的汇报。一整天，30个校长每个人都讲话。卢县长讲，这次培训对他们的教育影响是很大的。县教育局的局长说，从这次开会的状况就可以看出这次培训的效果。过去是不会这样开会的，或者说县里说的他们都听不懂。他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比如你要求他什么东西，校长的水平差异非常大。现在开会，明显感觉好很多，你说出要求，校长们就知道你在要求什么。

教师：教材通研

教师培训我们有过几种类型。原来是把农村的骨干教师抽出来培训一个月，就新课程进

行培训。这种师范学院培训有一个问题，它不针对个人，是一套程式化的东西。什么新课程的要求啊、逻辑啊，你也不能说不好，但是针对性不强。而且，它没有人和人的交流。此外，把农村老师抽出来到兰州西北师大，一个是人少，每期40个人，因为没钱嘛。第二，效果不大好。而且只能是骨干教师，而骨干老师的培训机会并不少，真正没有机会培训的是最一般的老师。于是我们想把山东的老师请到当地去做培训。果然，效果特别好。

山东的老师就要求我们帮他们备课。第一要告诉他们参加培训的是群什么老师；第二如何培训是通过讨论制定出来的。我们也没有上课经验，我们会说我们想要达到什么效果，怎么达到这个效果？进行培训的十个老师讨论以后，确定这个单元谁讲，那个单元谁讲。然后分成四个班，每班两位老师，两个老师机动。先讲什么？后讲什么？我们要把要求提出来，他们去备课，备完之后回过来再总结一次。每个老师把想好的东西拿出来讲，讲的过程中我们听，听了之后我们指出这里有或那里的问题。所以在培训之前，对培训师就得花很大的功夫。一件事情要做好，每个环节都要做好做细了。

去年的寒假和今年的暑假，我们在甘肃做了两期教师培训，每期200人，是数学老师和英语老师。每期130个数学老师，分三个班；70个英语老师分两个小班。讲课主要是培训教学能力，讲怎么上课。山东的老师会上一堂示范课，但培训主体不是示范课，而是怎么理解教材，理解教材的逻辑，课与课之间的关系。做一个好老师，我要知道我上这一节课的时候，在为下一节课打什么基础，掌握了知识之间的连贯性，就事半功倍。这叫教材通研，是培训的很大一块。有的老师是晕着教，抓到一本书之后，前后不看，抓着一本就往后走，他不知道知识之间的关系。第二，讲课的方法。怎么让学生理解，怎么让学生记数学日记，让孩子们每天预习什么，最后复习，复习什么。好几个老师在讲培训收获的时候，就讲到了数学日记。他们说数学日记非常好，马上回去就可以使用，一定会对学生有效果。他作为一个老师的敏感性意识到这种方法好。教材通研也很重要。教材逻辑掌握了，这个时候打好这个基础，下一步讲相关的新内容，你要把这个提出来，再提一提把那个记住了，两个都好理解了。所以教师一定要从头至尾的把教材研究一下。山东老师做的培训就是帮助他们研究教材，掌握逻辑，这对数学特别重要，后来普遍反映说这个很有帮助。

400个老师培训下来，大家都认为山东的老师讲得好，我们有非常详细的评估资料，10个培训师大概有8、9个人都得到一致好评。很多人会有一个感觉，他们不一样，他们怎么会讲得这么好。他们也是农村老师，精神面貌怎么会这么好，那么热情洋溢，讲课这么投入，我们怎么从来就没体会过，一个老师可以讲课讲得这么热情洋溢的。就是精神面貌的打动，本身我觉得有一种带动的作用。因此，我们意识到一点，教师的问题不仅仅是能力低、

水平差的问题，还有对职业本身的懈怠，除了把上课时间度过，没有任何其他的热情，没有教学热情。没有教学热情这样的问题，当然不是我们培训能够马上就能解决的，但是它有连带作用。就是因为人，人和人之间会触动，他会感觉到有一种精神。这种效果是大学里的培训根本达不到的。

我们还有一种培训就是直接去学校，校本培训。潍坊的老师除了到当地做大培训以外，也去一个学校听这个学校 16 个老师每人一堂课。同时，潍坊的老师上一课，当地老师也上一课，同样的课，上完我们来讨论。你的好在哪，也不是说你的都好，或者是我的都不好。讨论嘛。

此外，我们从 10 月底开始，组织当地老师巡讲。当地老师也有好老师，乡镇的，中心校的，县城里，甚至也有村校，都有。第一次的八位巡讲老师，三个是县城的，一个是村小的，剩下的都是各个乡镇的。挑选的一个方法，就是在参加我们培训的老师中间，注意观察发现优秀的教师。然后我们推荐到县教育局，他们再做挑选。本地老师巡讲，也用同样的办法，你上一节课，他上一节课，然后讨论。每个学校去三个老师，有语文老师、数学老师和英语老师。在这个学校让他们待三天，这三天时间里很多老师都在不断地讨论，这也算一个培训。

这个办法最早是一个中学的副校长跟我提起来的，然后我去教育局打听，当地教育局也认为会有效果，而且当地的老师巡讲，不需要花费很多钱。这个方法是比较实在的。实在就是在于他可以面对面的讨论。你上一课我上一课，我们俩个人都上同一节课，我们两个人的不一样，就比较出来了。看的人都在后面，大家对这两种不同的教法进行点评，谁的好，谁的不好，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而且，这不是表演，不需要事先演习。另外，这也说明本地的教育资源不少，只是我们的眼睛以前看不见。

我们第一次办了 200 人培训，今年暑假再搞。但那不是每个人都能来的，结果这次有 13 个老师自己来了，就因为听说这个培训好，他们自己要求参加。这种口碑的传递比什么文章宣传，比什么新闻报道就都更真实。今年来很不容易。因为他们暑假不放假，忙着两基验收。

两基验收全国去年还有 42 个县还没通过，今年还剩 8 个了。甘肃宕昌是之一。全甘肃省非少数民族县，就唯一还有这么个县没通过。基础教育确实是很差的。我们的工作点就是设在这样一个县，是最贫困的地区，教育最差的地区。但是我们在那儿工作一年半了，确实还是有变化。首先是老师有变化，然后西部阳光在当地的口碑都很好。你要去学校，他们都欢迎。这是很好的一件事。他们知道你们做事很实，都是为我们着想。教育局来说也觉得我

们很实在。

三、乡村幼儿园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十几所幼儿园了，这是通过很多工作实现的。我们的工作重点，第一是出钱盖房子，关键是墙角啊，铺地啊，厕所啊，都要以儿童的需要为主。我们第二个关注是组织课程培训老师，第三是玩具、幼儿图书、音乐等。做成一个幼儿园大概要花7万块钱。一个幼儿园第一年可能是40、50个孩子，等口碑建立起来，第二年可能就会有70、80个。一般每个幼儿园需要五个老师。因为我们是慈善服务，所以我们要求对家长不收费。如果当地已经有幼儿园，我们的幼儿园可能会跟家长收取一定的费用，但是我们机构不要求收费。如果幼儿园招收了贫困家庭的孩子，我们还可以给一定的补偿，因为我们是公益的性质。这个幼儿园项目有单独的资金。今年是27万，是专门给我们做5个幼儿园用的，只是用于硬件。至于老师的工资，我们一开始就支付一个老师的工资。现在我们已经做出的9个幼儿园，其中还有3个幼儿园是我们付老师的工资，其他的不用我们付。我们主要就管两件事：一个是教学用品，另一个是教师培训。

我们是在做一个教育的工作，不是在完成项目。完成项目要有项目显性的指标，只要把项目的指标达到了，我就完成任务了。但我们不是，我们虽然也采用项目的形式——因为筹款要用项目的形式筹——但是我们都很清楚我们是在做教育。所以，着眼点层面是不一样的，是放在教育上的，考虑怎么样可以让学生真正受益。

比方说，幼儿园必须有家长的参与，但是我们的家长没有参与的习惯，我们在这方面就要去做功夫。其实，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很费劲，这种事不需要钱，需要用劲。做这种事对筹款也没有好处，对花钱也没有好处，但要费很多劲。但我们考虑，我们是在为学生做事情，是在培养孩子，因为对幼儿来说，家长的教育非常重要。那我们怎么做的呢？怎么发动家长呢？幼儿园一定要附设家长学校，这个一定要要求。幼儿园老师自己都不觉得需要家长，还认为家长很讨厌，所以我们首先要做幼儿园的工作。我西部阳光组织不能明确开办家长学校，得让幼儿园自己去做。当然，一方面要给他们任务，另外一方面要让他们看到效果。首先是要去带动，在一个幼儿园把所有的家长请来，半年之内，至少要有三到四次家长活动，跟家长对话，让所有的老师都有体会。这很有效，对老师也是一个指导。

谁跟家长对话呢？我们的志愿者。我们跟幼儿园的老师先做准备，做完准备之后我们把家长请过来，第一次由两名西部阳光的工作人员主持，让幼儿园的老师一起跟家长对话。我

们事先要预想好，这一次我们要给家长传递什么信息。传递之后家长会反馈，表示他同意不同意，或者他们有什么反对意见，然后我们就根据他们的反馈再对话。

我们才做了第一次对话，两个半小时，主要是关于幼儿园的目的是什么，让幼儿园的孩子识字、做算术到底好不好。我们给家长传递的就是儿童智力和心理发展的一些规律，让家长要认识到过早要求幼儿识字、做算术，对孩子不好。智力开发是有它的规律，你不能去强迫家长接受，必须先让家长针对这些孩子谈问题。我们先做了这一次，让幼儿园的老师都看见，他们就发现特别有效。这比我们做多少动员工作都好。为什么呢？本来家长对老师会有压力，他们会觉得我的孩子没学习，老在玩。通过对话，就告诉他们什么是儿童心理、生理、智力成长的表现，她的智力成长表现为他会玩。别着急，别把4岁孩子的学习弄这么难。在一定的時候他会进入状态，会识字很快。现在让他识字早了，以后他就不好好学了。但是，我们不能够照本宣科地去讲，一定要有说服力，所以就拿幼儿园里面的几个孩子来做比较。比如以某位家长为例，你说老让孩子学习学习，其实看看你的大儿子，他在幼儿园习字学得最多。现在呢，他到了三年级，成绩好不好？一点都不好。他为什么不好？这样的例子就特别有说服力。拿出他们自己的孩子做比较，跟家长说幼儿发展有什么特点：比如说四岁到五岁的时候幼儿主要接触什么东西，用什么方法，他会特别的轻松，儿童玩的时候接受能力最强，你要给他讲故事，等等。

这样的对话，我们准备半年之内做四次，让家长共同来参与，就是让他们配合幼儿园的工作。后面几次对话的主题还在筹划中。第二次会就幼儿营养和健康的问题进行讨论。第三次讨论好习惯，哪几个习惯是必须在幼儿就养成的。关键的有几方面。第一个就是早上洗脸和刷牙。让孩子独立地早起，一般四五岁了，白天他应该自己可以走到学校。不要去帮忙，甚至不要去提醒他，让他自己知道。因为人是有感觉的，次数多了他就知道怎么做。早上起来他自己就开始洗脸刷牙，这就是说好的基本的生活习惯养成了。

第二个习惯是从哪里拿的东西放回到哪里去。这需要家长的帮助，去配合老师的要求。每天放学的时候，家长来接孩子，老师就要求儿童把自己今天拿的东西放回到原处去。原处是哪啊？从哪里拿过来的，想好再把它放回去，放好了再让你回家。类似的要求，告诉家长，家里也要这样要求孩子，要家长配合，养成好习惯。

此外，就是吃饭的习惯。在幼儿园吃饭，孩子们不让乱走，要坐在一个地方，吃饭的时候不说话等等。这些要求，回家吃饭的时候也要贯彻，要求家长配合养成这些习惯。幼儿园就是培养这些跟日常生活很紧密的规范的习惯。

这些是基本的对话，准备开始半年举办四次。得有这个理念，办学一定要得到家长的配

合，让家长参与进来。我们自己专业知识也不够，也不是天然就会培训家长，所以也不是马上就做得好。但是得有这个意识，关键在你做不做，不在于马上就做得好。但一定要有这个意识，让老师和家长们沟通，大家有动力一起帮助孩子的成长。什么有效，什么没效，讲什么家长能够接受，这个都是在不断沟通、对话、反馈中，和老师和家长一起慢慢摸索出来的。家长其实也愿意来。这一次我们在一个幼儿园做，那个幼儿园 50 多个学生，来了 40 多个家长。就在村里举行的，家长们还很积极。

接下来，就是考虑怎么能帮助儿童语言发育、语言成长，设置什么课程？幼儿园能设置什么课程？就是玩。怎么玩？幼儿教育不是我们的长处，在课程开发上我们跟另外一个组织一起在做，做一套适合中国农村幼儿园的课程。

语言成长非常的重要，开口的能力好不好，跟幼儿阶段大有关系。家长培训中，我们也强调让家长给孩子讲故事，不管讲什么。其实讲什么不重要，比如说爷爷奶奶讲的什么小兔子呀，都好，不管是什么，只要跟他讲话。为什么？因为讲话使他的词汇丰富了，故事有吸引力，孩子有兴趣。第二，他的语感怎么能培养起来？农村的孩子一讲话讲不清楚了，就“这个、那个”的，表述不清。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词汇量少，一个是句子短。都跟他们不听故事有关，他们很少听到完整的话。所以我们让家长给小孩子讲故事。能讲就好，起码他能讲故事，不能是一段一段的，就是要让孩子接触完整的故事，这个对他们未来语文的能力影响非常大。四岁到五岁这个阶段是语言能力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个是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几乎都公认的。而这个时候儿童正好在幼儿园，因此幼儿园的工作非常关键。

所以我们跟家长对话主要就这四项，第一个是学不学、学什么、快还是慢。第二个就是营养、健康，第三个是习惯，第四个是语言。先跟家长沟通，让家长学到一些东西，让他们去思考这些东西。不能指望说通过几次对话他就改变了，而且改变家长也不容易。但是，起码有一部分家长，不一定文化程度有多高，却是真正对孩子负责任的，他就会愿意听。只要觉得对孩子成长好，他就会愿意听，就会愿意想。我想，起码能影响一部分家长吧。也不敢有把握说做得多好，一点一点来吧。

四、NGO 的优势与挑战

西部阳光行动的整体营运资金比较大，光是资助一项就用掉几百万。仅老师的资助一个人就要 200 块，10 个月就是 2000，100 个老师就是 20 万。我们有一年资助款是 50 万，另外一年是 56 万。我们 2007 年筹到 100 万，2008 年是 267 万。2009 年如果能筹到 350 万，那么我们基金拿到的就是将近 400 万。其实，我们做的不是耗钱的事情，是建能力的。有个

几百万块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我们在宕昌做了那么多事情，才花六十几万块。

我们的优势是什么？第一，跟杨东平老师有关。首先是杨老师在教育界的号召力，其次他对教育的宏观历史有了解，宏观上对教育有想法。第二，我们对教育资源很熟悉，既熟悉国际组织，知道国际组织的特长在哪里，也熟悉国内的非营利组织。这样我们来组织资源，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这是多年的积累，是我们的比较优势。

第三，我们的团队很年轻，他们全都才二十多岁。全是小孩子，但是各个都能独挡一面。有一个在宕昌的女孩子去年大学刚毕业，今年就可以一个人在宕昌待着，另外几个男孩子也都是这样。我们整个团队一直都有这样的念头，就是教育。首先这一路受的教育是什么？事实上每个人都受教育，但是未必理解教育的问题是什么，所以内部的学习很重要。从内部的学习机制来说，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分工，自己担，但是对所有的工作都要了解，这是要交流的。所有的人出差回来都要写一个出差报告；每个月有一次交流。报告是必须的，就是告诉我们出差的时候你们去干什么，解决了什么问题，在此过程中思考了什么问题，有什么触动。

第四点就是多思考。我们有一个邮箱，把所有关于教育的思想，我自己想的、别人想的，放在一个邮箱里面。经常一天或者几天下来大家就会有新的东西出来。让脑子时刻保持思考，我觉得这对小孩也非常重要。大家要想问题，教育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这件事情应该这样做，而不那样做？思考就是不断地提问题，大家来谈，根据工作来谈，会找到很多值得思考的东西，发给大家阅读。这不是那种课堂学习的模式。大家都会在工作过程当中，不断的把问题拿出来讨论。

这里要强调的，一般 NGO 并不把自己看作是在从事教育的工作，而是在完成项目。完成项目是有项目的显性指标的，我只要把项目的指标达到了，我就完成任务了。但是我们不是，我们虽然也是项目的形式——因为筹款要用项目的形式筹——但是我们都很清楚我们是在做教育。着眼点的层面是不一样的，是放在教育上的，考虑怎么样可以让学生真正受益。比方说我们的幼儿园怎么去授课？如何让家长参与配合幼儿园的工作？等等。

不过我们这样的工资不可能找到做很长时间的人，对团队的专业知识也有要求。这就转到我们面临的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合作范围，即我们到农村去做教育，去同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的合作。这种合作实际上缺少制度支撑，完全因人而异的。也许我们在地方教育局找到了一个好人，合作可能就顺利。当然这里面也有互动的因素，也因人而异。为什么说缺少制度性呢？在对教育局的考评当中，教育局的官员不必要去获得专业性支持，他们完全没有形成这样的观念。

他并不认为获得专业性的支持是他必须做的一件事情，是一件好事。我们发现，一般从教师一直升上来的官员，你可以去找，相对来说会容易理解一些。而大的教育局的局长就会令你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哪里跑来的人就到教育局来当局长。这种局长一般都不容易理解我们的行动，但是我们必须得到教育局局长的支持。因此，第一个问题就在于没有制度性的支撑，合作方面随机性太大，完全有可能我们做到一半的时候官员换了一个人，就实施不了了。

第二个问题，现在的学校越来越没有办学自主权。学校的行政管理权在中心校，在村小校长没有任何的权力。我们为儿童成长而做的教育改善的努力，需要获得校长和教师的支持，但教师和校长没有内在动力。为什么？因为教育评价机制。我们所言的儿童成长，在行政指标中是没有这个东西的。校长没有办学自主权，他只是接受行政考评，所以真正要他做什么并不容易。

第三个障碍是我们本身的专业能力。如果我们要往纵深的内涵去做的话，我们本身得是教育专家。NGO 是一个随机成长的过程，它不是一个定量配比，要这个机构里面既有这样的人，又有那样的人，它不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我有很多的教育经历、阅历，我自学能力很强，我学一点东西，也许马上就可以。但是我们的队伍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要退休的人，一种是大学刚毕业，中间的人是不会进来的。这个时候就对专业团队的挑战特别大。这个问题非常难解决。因此我觉得能做成我们这样已经很不错，因为再做上去已经不可能了。我的团队没有这个能力往上做，那么基于目前的人员我认为这样就可以了。

第四点就是筹资。筹扶贫类、资助类的钱好筹，而教育改善类的就不容易。我觉得这真是很有趣的。尤其面对企业的时候，告诉他我要资助 100 个学生，我们要盖 100 所学校，他们听得很明白；你说教育改善，他听不懂。当然，说教师培训他也不是听不懂。但我们有很多事情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改善教育体制需要对教育有一个认识，才知道什么叫教育体制的改善。这个话写起来蛮难写，他不是一下子就能懂的。可是，一两句话听不懂，他就没兴趣了，所以筹资实际上是很困难的。我们筹两年的款都困难，五年的就根本就不敢想，筹不到，百分之百筹不到。

NGO 应该起的是引导、创新和典范作用，这些事不是政府做的事，但是政府要给资源。资源都在政府手里，可是绝不会向我们倾斜。以上的问题不是我们一个组织的问题，所有从事教育工作的、做教育提升的组织都面临这样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看起来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需要解决外部的问题。但也不是完全无解的。

再比如筹款的困难，我觉得这个社会的分工还是正常的，需要有专门做事的，也需要有专门给钱的。基金会这种机制就是为这个设计的，这是一个好机制。我认为这就是现在商业

社会延伸出来的一个社会功能。挣钱的就一门心思挣钱去了，挣钱本身是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花钱也需要专业的东西。谁把两者联系起来的？基金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设计。但是这个中间还是有一个理念的问题，三方的理念经常都不配合，工作对象不一样。基金会的任务是花钱，但它面对的不是消费者。现今基本的资助方式是随着项目走，项目的中间把人力的需求缩小，很少专门支持人力的经费计划。我们基金会里面就有专门支持人力的一种设计，让捐赠方真正看到人力对公益水平的重要性，肯为人力花钱。一方面，我们把工作尽量提升为专业能力，让有眼光的捐赠者更多地看到专业能力的重要性。然后你做得更好一点，他再做得更好一点，你再做好一点，他再做好一点。是这样一个互动的过程，可以慢慢提升，不是没可能。

所以，我会说，如果大家希望把教育的事情做得更好，那好，支持我，支持我们去请好老师。假如给我们的一个专家一年发 10 万块钱，但我告诉你，这 10 万块钱可以影响 1000 个老师，你干不干？这是一个什么效益？我可以影响到 1000 个老师，我已经做到了，我拿给你看，这个时候他才觉得这笔投入是值得的。这里的前提是你要先做事，在你现有的水平上，你要做得尽量好，让人们看到专业化的事情能够有什么样的前景。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我想说，所有的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总不可能某一天谁都愿意给你钱，没这好事！我们有这么多年的经验，有好的人，就容易做出好的事儿。反过来说，好的人也不是同一模式上出来的，是随机生长的，好的人和好的钱结合。民间社会、民间组织就是这样成长的，它是一个有机生长的过程。所以我不去想某一天有一个很好的政策，突然企业都愿意给 NGO 们钱了，没有这个事情。

我们团队现在一共是七个人，再加上几十个志愿者。就这么多人也能做成现在这样，所以要看你怎么做。当然这是需要学习的，不断地向上提高。你的综合能力越高做得越好。NGO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团队变化相对较快。这当然有很多的社会因素。但是，即便在同一个社会条件下，组织的发展也有不同，也有做得好的，做得不好的。所以先不要说大局限；即使在大的局限下，也有努力的空间。努力到了一定的空间，可能就上去了。改善大的局势也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但是不能说因为大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小的事情就不做，这不可能的。我觉得这两方面一定要掌握一个平衡，就像我前面讲的四大局限，不是没有意义，都有意义，没有大环境的突破，这些问题的确也不能够很好地解决。大环境的突破也很重要，譬如教育体制的问题，整个城市环境的问题，这都是要突破的。但是这个突破是等不来的。我们自身的努力本身就是突破点。怎样想，就怎样去做，做着做着可能就会好一点。一直做，新一代也就起来了。

象牙塔与泥巴墙¹（上） ——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三年培训总结反思

潘家恩

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才到农民生活里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我们希望抛下一切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²

——晏阳初³

引言

“象牙塔”与“泥巴墙”向来代表着“高等学府”和“农家院落”，分别象征着精英/知识的“阳春白雪”和平民/生活的“下里巴人”。二十世纪不同时期的几波“知识分子”开始一次次地走向民间⁴，以不同形式的“走出”前者 and “跨进”后者进行了难得的突破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在这个至今仍进行的运动中，象牙之塔的环境和泥巴墙里的人们都已经发生了不少的变化，“走出”是否意味着完全的抛弃？“跨进”是否意味着使命的完成？在一出一进的过程中，是否更需要反思“象牙塔”和“泥巴墙”两者本身的问题以及我们对它们的想象。对笔者来说，它意味着更多问题的开始。

除了在行动精神和对传统知识分子定位的挑战外，晏阳初先生等同仁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劳工营，盛于民国期间的华北、华西乡村，最后传播范围达自海外诸国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为我们留下的，还有十分丰富的农民教育及知识分子如何参与社会行动的操作经验。比如，他对知识分子（外来者）与民众关系的认识：

我们有两个发现，那是真正的革命。其一是我们学会了评价农民。多少个世纪以来，我国的农民从未受过教育，这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我们发现农民所缺少的不是头脑，而是机会。于是我们发现了所谓“苦力”的巨大力量。我们的另外一个发现同样令人吃惊，那就是认识到我们自己——知识分子的无知，并且受到了我们自己农民的教育……⁵

¹ 原文发表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77期，2008年12月，页253-287。

² 晏阳初著，宋恩荣主编，《在欢迎来宾会上的讲话》，选自《晏阳初全集》第1卷，1989年，湖南教育出版社，第221页

³ 晏阳初（1890—1990），近代中国著名教育家，一生致力于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民教育及乡村建设运动。

⁴ 据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的说法，从“五四”以来至今，共计应有六批大规模的知识分子“上山下乡”

⁵ 晏阳初著，宋恩荣主编，《关于乡村改造运动的总结》，选自《晏阳初全集》第2卷，1992年，湖南教育出版社，第401、402页

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实践奋斗数十年后，晚年晏先生的这段总结至今仍可以成为我们这些后来者开始行动的出发点。

在具体的操作上，晏先生对定县等试验区整体工作的设想：以各种层次的培训教育为训练“种子（带头人）”及普通民众的手段；以试验区建设为“选择、确定和验证”培训教育内容的“中试车间”，同时试验区也是培训成果的实习、示范和检验场；而在培训和试验的整个过程中，都有非常细致深入的观察、研究和总结，对这种行动中的研究，他当年是这么认识的：

*“我们的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乃是为事而研究。又可分做三点说：一
是为问题而研究，二是为实施而研究，三是为训练而研究。”⁶*

这种研究不只是为了研究者个人（团体）的需要，还考虑当地人（被研究者）的需要，一方面与他们共同计划共同行动，同时研究者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进行总结、反思和调整，并及时将结果反馈给“共同的行动”，行动者与行动对象互相影响。正是这种研究，如果和试验结合起来，则为培训和教育提供了全新的方法和实践中产生的鲜活案例；如果和培训教育结合在一起，则为试验区提供了各项建设的理论。而研究、试验、教育培训三者紧密结合，就是“定县实验”的最终目的——虽然花费了一定的人力和物力，但取当年中国社会的千分之一为单位（当时中国总人口为四万万，定县刚好为40万人），参考自然科学的一些方法，以实际社会生活取代书斋为参与单位（社会实验室），在努力带上“农夫眼镜”的“农民化”过程中，反省知识分子及知识本身的问题，总结各种困难及可能的改进办法，进行建设性的行动实践，同时以“研究、培训、实验”来将参与的成果巩固下来，和农民们一起，形成文字和经验，进而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推广。

当然，这样一个大胆而“有野心”的设想也遭到很多方面的批评。但其中将行动、研究和试验相结合的做法，却对我们这些希望能在行动层面上做出更多参与的普通知识分子来说，确实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几十年后，伴随着各种思潮的引入，“行动研究”也进入了国内各高校研究者的视野，“为行动而研究、在行动中研究、由行动者研究”、“与研究对象共同参与”、“研究者学会反省”开始成为了一个新的研究方法，更成为挑战我们如何看待研究，研究如何有用，如何处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关系，研究如何能更直接的参与社会变革等棘手问题的新思维。

作为一个参与当代乡村建设实践的后来者，藉着鲜活和亲历的各种案例，我也尝试沿着

⁶ 晏阳初著，宋恩荣主编，《乡村运动成功的基本条件》，选自《晏阳初全集》第1卷，1989年，湖南教育出版社，第305页

前辈的思考，利用批判教育学等理论和行动研究方法进行一点阶段性的总结和反思。

一、培训总结

作为一所为当代农民带头人提供免费培训和进行乡村建设各方面实践研究的非营利组织，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成立于 2003 年 7 月 19 日。学院针对各地农民带头人、具有实践意愿的乡村工作者和关注农村发展的各界志愿者开展农村合作经济、农村工作方法、生态建筑、生态农业和乡村文艺等方面的理念和技能培训。

在此基础上，学院鼓励学员返乡后在家乡开展乡村建设实践工作，目前已通过多期培训和各种后续支持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数十个新农村建设试验基地。通过与学员及基地的充分互动，积极收集整理各地乡村建设实践经验，并以此为基础开发符合农民及农村工作者接受特点的课程体系。

截至 2007 年 4 月 16 日止，除试验区村民、大学生和志愿者培训外，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共举办农民培训 17 期，培养各地农民带头人 779 人，推动全国范围内几十个农民合作组织（文化、经济）的成立，共计超过一百家农民合作组织的骨干接受了学院的培训。⁷

一片新天地——培训的设计与内容

虽然成立于 2003 年，但由于人力、资金等方面的实际困难，我们从 2004 年 4 月 18 日才开始面向全国举办第一期农民培训班，根据温铁军院长的建议，这期培训以“中国农村合作经济与乡村建设”为主题，为期两星期，来自全国各地约六十名农民学员参与了培训班学习。

虽然培训还算顺利，这一期培训班的很多学员也成为了至今在各地推动新农村建设实践的骨干，可当时我们的心里却非常没底，还没有形成团队的同仁间充满了焦虑、紧张和不一致的意见，既因为面对一个已经荒芜多年的乡村中学校舍（建于上世纪 50 年代），与培训相关的基本后勤设施（吃、住、学）都要从头开始。更重要的是：现代教育训练出来的我们，基本上还跳不出自己被教育经历所产生的影响，虽然我们都对晏阳初、梁漱溟等前辈的理论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也尝试了解和多次讨论过他们当年的实践方法。但当要我们真正地去

⁷ 周锦宇，2008，《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合作经济工作总结及大事记》

组织一期面对农民的培训时，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想象：是按惯常先有教材、教学大纲、教师，然后再有培训？还是先有培训，再从中慢慢的总结发展出这些东西？

同时，我们是这样设想可能的学员：各地新农村建设试验区县乡干部、村支部书记、农民带头人，致力于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骨干。但在招募过程中，我们却遇到了一个非常普遍性的问题。正如两年后的一个学员所说的：

“我这次到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去学习，我的心情特别高兴，因为我只是一个农民，地地道道的农民，在社会上没有身份地位，没有文化，更没有资格学习培训，所以说，是你们给了我一个深造的机会。给了一个农民的希望，一条光明的路。是你们看得起农民。我在这里也没有过多花言巧语。我们心里感谢你们，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我在走之前，尽关（管）我的心情特别高兴，可是我的压力特别大，一是我没有出过远门，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并且还是我一个人，而且我去面对的都是大学生，教授，研究生，他们的知识是那么丰富深奥（奥），他们讲课的水平一定很高的，而我的水平很低，听不懂，领会不了那咋办？”⁸

我们如何去面对农民学员大脑中已有的关于“培训、讲者、知识”的定型化想象？认识起点和已有知识程度很不一样的农民学员坐在一起，当然和正规教育中按阶梯上来、相对同质的学生（小、中、大学生）不一样，我们可以从什么方面切入？那些抱着很具体的目标，却只能参加短期培训的高度社会化了的成年农民，我们应该培训什么？总之，带着很多很多的不确定因素，我们硬着头皮开始了第一次培训的组织。

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自己，不知道培训该怎么展开；另一方面由于已经对“学习”有着固有的想象，我们曾经固执地坚持，学员们这么大老远的过来，很不容易，所以需要给他们“安排”更多的内容，这些内容之间是怎么样的联系和展开的，最熟悉高等教育那一套的我们，很熟练的将他们按照“专题讲座”的“拼凑式”进行了排列。讲者应该谁呢？固有想象已经让我们认为各位“三农”领域的专家当是最理想人选。于是，通过院长个人的关系，我们请到了一批很有志愿精神的“三农”研究领域大腕，他们不辞辛劳从北京过来义务为农民讲课，深深地感染了学员们。所以，第一次培训中，虽然很多学者的观点很不一样，并以“理论”和“讲解”为主，有些内容连受过高等教育的我们听起来都有点吃力，但学员们却听地十分认真，很细致的做笔记，这个机会对于他（她）们来说，是多么的难得！

专家讲课后马上就要回北京了，学员们往往团团围住，有人要专家留下联系方式，将来有问题可以咨询，有人则要求专家签名，还有人要和专家合影。合影做什么，在往后我们对

⁸ 引自陕西永寿学员李慈爱，《学习心得》，2006年11月24日

学员的探访中发现，通常会被冲洗放大，放在已成立组织办公室的显要位置，它既可向其他村民展示自己外出学习的成果，又可使自己推动的工作具有更大的合法性和社会资本。所以，专家的讲课让我们明白，学员们是否消化他（她）的讲课内容只是一方面，但他们给学员们带来的将是更多——被尊重和感动（原来专家学者也关心我们）、光环和社会资本（回乡建设时可能获得更多的认同）……

但经后来的进一步反思，这种以我们为出发点和参照对象，去想象和安排给他们的培训内容，并“用心良苦”的安排“越多越好”，除了让他们感觉压力很大，消化困难外，是否我们正在压缩他们的主动性和思考空间，是否正不自觉的掉入“教育者—被教育者”，“安排—被安排”、“师—生”的二元对立中，而我们的习惯和“自我感觉良好”是否正在强化着这种关系。似乎更多的例子也可以说明这点，虽然专家课后被围着“互动”，但在课堂上，却鲜有人有勇气与专家“面对面”，即使在课后，积极“互动”的也只是平常就很活跃的学员（通常是男性），而那些普通的学员却因为身份的差别而保持了天然的距离。

所以，在第一次培训结束后，受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随后（2004年5月）在学院组织的另一次农民培训的启发，我们对农民培训应有的特点和将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反思。

我们培训的出发点和内容应该是什么？陶行知和费孝通都曾尖锐的指出农村教育的问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脱离生活，它可能使得作为改变生活/社会工具的教育最后却堕入一种所谓的“屠龙术”。所以培训内容就必须与他们的生活高度相关，从生活中来，并且还能回到生活中去。从第一期培训开始，我们培训的主题都围绕着农民的合作组织，既因为长期进行农村调研的温铁军院长认为农民合作组织是目前缓解“三农”难题的基本思路，更因为合作的需求、好处、条件和案例都已经存在于学员们的生活中，培训中大家有话可说，培训结束后，学员们也可能将学习到的基本知识和其他地方的经验教训结合到自己村庄的发展中（2006年底合作社法出台，同时也提供了法律保障和推动力）。

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每个学员都已经不是白纸一张，如何能建基于其认识之上，并根据成年人的思维特点进行设计，是对我们的一大挑战。而“以问题为导向”慢慢成为了我们的整体思路——把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事物、困难和解决办法问题化，既可调动大家的兴趣和联系自己生活的能力，又可使整个培训安排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例如以“农民合作组织”为主题的培训，我们不会从“合作组织”的定义或概念开始，而是围绕“为什么要合作—合作是什么—合作起来干什么—应该怎么干”这一主线来设计安排整个培训。培训的第一课，我们也会直接由问题开始，如分成不同方面（经济发展、教育培训、文化乡风、民主管理、生活环境）的小组，各自讨论目前自己所在或所了解的农村中：

1、现状是什么？2、在这一方面，阻碍农村发展的原因是什么？

通过这样的开始，在让大家有话可说（都是一些熟悉的东西）的同时，通过碰撞和各地经验的交流，直接归纳引出目前农村中各个方面的问题所在，以及可以采取的行动方向。

在培训中我们发现，如果光讲理论（如合作组织基础知识），农民参与讨论将很困难，那些已经归纳好的抽象的条条框框可能便于他们抄下来，但却难以让他们联系起自己，因为那不是他们的思维习惯。相反，当我们通过视频等方式介绍一些具体的案例时，大家的讨论就会非常的热烈，既因为这些案例都比较具体，是他们讨论和日常经验中可及的范围，更因为案例中的人和事和他们自己相似，容易让讨论者有换位的可能，这也将使学习者离相对明确的学习目标更加贴近。

如果说培训内容应紧贴他们的生活，那还将面对一个问题——客观上已经与他们的生活有着不少区别的我们，如何去走进/理解他们的生活？我们自己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比如培训“农民合作组织”，其中很大的困难是，我们如何和学员们说清楚——新的合作形式和当年的人民公社有何不同。虽然，从理论上，我们完全可以讲的简单明了。但我经常问自己，对于我们这些基本没有受那段历史影响的年轻一代来说，那段如此深刻和影响深远的历史真实是否会因我们的几句话而得以区分，它对我们来说，可能只是一段历史，但对于他们来说，那就是他们曾经的全部生活和记忆，更是他们对“合作”这类似主题的主要想象来源，其中拥有太多的情感因素在里面。

而以“理性”自我标榜同时也是自我束缚的现代知识，在面对这一个个既是遗产更是债务的议题时，却往往又是那么的简单和轻率。

以农民教育农民——培训的形式和特点

相对于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成人教育本身有着自己的特点。较之未走入社会的学生，我们每个学员的起点、特点和社会化程度都不一样，有的人特别爱表达（本来就是社区的意见领袖），有一些人就特别的沉默（乡村环境长期形成，或到一个新环境后不适应）。当然，我们可以通过很多协作者的技巧来避免个别人的过多参与，并让沉默者发声。但如果在这种以说话为唯一的表现方式和衡量标准面前，不管协作者多么的鼓励和讲究技巧，那些不爱说话者将永远处于弱势。所以，我们是否可以不让大家简单地“齐步跑”，而是针对大家的差异可以有多种形式的教育和表现方式呢？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让受教育者可以从被动的接受、

受惠者，转化为主动的参与者，乃至贡献者？⁹

例如，当我们在培训中间，穿插设计了文艺表演和打气小组（让大家通过轻松和娱乐，有更好的精力参与学习），那些老人（很多老同志都有地方文艺特长或参加过早年的文艺宣传队）、妇女以及一些不爱说但爱唱的人，就有了自己的表现舞台和参与机会，同时也能突出自己在培训班中的价值。又如，为了加强纪律训练，让学员除了学习合作组织知识，还让大家在实践中找到合作组织和团队的感觉，我们特别安排了早上的队列训练，期间邀请曾经当过兵的学员成为不同小分队的队长，也许，这个队长在平常很沉默，当在这个环节，他却可以让自己的身体成为语言，在帮助大家训练时获得认同，还可更好地理解团队领袖应该怎么做，同时也在服务培训班的其他人中，找到自己的价值。

培训一开始，我们还会鼓励学员们自我服务，每个学员参加一个小组，小组选出组长，独立运作，以完成寓教于乐（打气组）、自我管理（纪律组）、自我服务（生活组）和反馈学习问题（学习组），这些小组不仅大大减少了培训团队的后勤工作量以提高其他方面的培训质量，锻炼了大家的组织能力（特别是组长），更淡化了“培训者—被培训者”的身份关系，让传统意义上的被培训者成为培训班的主人，在唤起其主体意识的同时，也提高其参与的质量。

总之，多形式的培训及各种辅助手段的设计，既是考虑到成年人学习、思维和接受的实际特点，尽可能调动大家的“嘴巴、耳朵、大脑、身体其他部位”，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感知，并希望可在课堂内外的方方面面都有机会接触感受到合作组织这一主题，从而完成广义上的学习。

自古以来社会分层一直存在。如前所述，作为社会精英、更多社会资源拥有者及农民眼中的权威，专家学者主动的走入农民中间，放下精英及知识的架子，不仅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还对农民学员起着直接的精神激励和后续支援的作用。所以，每次培训班邀请一定数量的专家学者讲解是非常有必要的，但与学员相处时间有限的专家却不能取代另外的两种“老师”——农民自己和协作者。

作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及拉丁美洲另类教育重要思潮的钟钩（Bell Hooks）女性主义教学法强调在感性层面上的交流，抛弃理性化的启蒙概念，鼓励学生道出自己的生命故事，去分享他们/她们的经验和感受，并认为这样可以颠覆一直以来思想与身体的分离及异化的课堂气氛。¹⁰

⁹ 夏晓鹃，2002，《流离寻岸——资本国际化下的“外籍新娘”现象》，台湾社会研究丛刊—09，第208页
¹⁰ 阿葛，《由费尔雅到钟钩——浅谈另类教育理论》，选自《基进论坛——香港文化社会评论期刊》，1998

而中国本土的教育家们则更为直接地呼应着中国的实际国情，无论是陶行知的“小先生制”，还是晏阳初的“导生制”，一直以来都是针对如何将有限的教育资源最大化，而在教学方法上进行创新——老师不够的情况下，人人都可以是老师，“大小孩可以教小小孩”！何况是已经有一定阅历及建设家乡想法的成年农民。

和专家们的专题讲座一道，我们专门设计了“我们的合作故事——学员经验分享”，每天上午都有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邀请学员作为主讲嘉宾，分享他们的经验、计划和困难，同时也希望更多的学员参与讨论。当然，和做学术报告不一样，我们的农民朋友有拉家常，说故事的习惯，但可能难有聚焦和形成观点的自觉，这时，我们的协作者就可以帮助做出总结。正由于讲者就是普通学员自己，所以听者自然认为比较实在，提问和讨论也很自由，不再是高不可攀。

由于我们的培训班是一期接一期，作为一种后续的支持，我们鼓励培训班的老学员回乡进行实践，作为支持措施之一，我们会给他们新成立组织的其他骨干提供参加新培训班的资助（报销部分路费、免交任何费用）。同时我们也会邀请这些老学员回来讲课，分享他们回乡后的具体经历及经验教训，而这种做法本身就能起到一定的榜样作用，既让他们的经验以案例的形式被开放的讨论，同时也可以帮老学员出主意并锻炼其表达和分析总结的能力。

同时，在每一期培训班的学员选择上，我们专门安排一定比例有合作组织

经验（想法）的学员参加，既因为这样能有更多经验可以分享讨论，同时也在平常的培训中可以对其他学员起到带动作用。

所以，既是以农民教育农民，也是以农民影响农民。交流慢慢成为了培训的主要形式，而培训班也同时为农民提供了一个他们之间交流分享的平台。

而在这个过程中，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则要从正规教育约定俗成的角色和态度中释放出来。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协作者自己的角色需要更多地转变成组织者、提问者 and 总结者，学员们都自我暗示地需要“外来的和尚”，但也许不是想听他念什么经，如果“外地和尚”能搭起一个大家都可以发言的道场来，“本地和尚”“外来和尚”却有可能共同“论法”。

除了对教育者定位的想象外，同时需要解放的，便是那个对培训空间的想象。习惯的经验告诉我们：传统教室的空间布局本身就是非常明显的权力关系，它强化了讲台的占有者——教师的中心和权威者位置，并固定了下来。

当然，和很多培训一样，我们也通过调整桌椅的位置，尽可能地改变这种由空间所形成

的权力。但除此外，理想中农民培训的环境应该是什么样子？第一，应是和培训的主题能吻合；第二，应和学员的日常生活相对协调，同时提供一个相对舒适的环境。

我们经常听说，很多组织都在宾馆举办农民培训（可能的确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地方，可以理解），但据侧面了解，它可能因此造成一些培训之外的影响：一方面，可能让农民感觉很不自在，那种环境和房间布置，虽然可能会让农民感觉新鲜（可能还有兴奋），但相信对于大多数普通农民来说，应该谈不上舒服，因为太不习惯。另一方面，住宿的价格不菲，会让他们形成很大的落差，虽然不用他们出钱，但很多农民都会在私底下琢磨，这么住一天，等于自己多少天的劳动，如果能把钱直接给我们（或帮助我们做事）不更好吗。而这些，都有可能间接地影响培训效果，甚至让学员以此怀疑培训方的诚意。

由于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本身就在村里面，本来就是一所废旧的乡村中学，没有外来的投资，主要的设施都是按照乡土特点，由志愿者和学员通过义务劳动一点一滴的完成。很多农民在这样的培训环境中可能有这么几个感觉：简朴——因为吃的都是农村常见的粗茶淡饭，也没有专门的服务人员；舒服——学习、生活、基本运动（乒乓球等）、洗澡等基本条件俱全，60多亩的校园也有足够的活动空间；新鲜——台湾建筑师专门为乡村设计的生态厕所，多功能结合的“四位一体”大棚，生活中有心的点点滴滴都有可能成为示范学习的模型。还有农地、果园和经常来访的村民……。而我们所希望的，也正是创造一种与他们本来生活环境相似的、宽松的、和谐（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小环境，让学员们既感觉自在，又有在其中学习和思考的空间。

正式培训课外（如上下课时间，吃饭前后），我们利用校园的简易广播播放一些团结、励志、向上等与培训主题相吻合的歌曲，同时还有一些培训期间学习过的歌曲，以帮助学员巩固练习，回去后可教给更多的乡亲。同时让整个校园都有一种积极和鼓励的气氛。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还鼓励学员可以将自己喜欢的话贡献出来，然后挑选出通俗易懂和与培训主题相近的，让他们自己用红纸写出来贴在教室里，与更多人分享。——“应做带动人，不做落后人”、“一人进步不算进步，大家进步才算进步”、“不要为成功而努力，要为做一个有价值的人而努力。”——当这些学员们自己的话贴上教室时，自然带上了特别的涵义。

如前文所述，我们要挑战教室做为唯一的培训空间，那还有什么样的形式既能解放出学员，同时也能顺应成年人交流上的特点？学院采取的一个办法，就是在课程安排上穿插了田间劳动。它正慢慢成为我们的特色和对学员的基本要求，既因为有些生态农业的课程需要在田间进行观摩和操作，还因为学院希望建设成为“真正的农民自己的学院”，所以我们很谨

慎的对待外部投入，不希望因此而成为另一个政绩工程或盈利工具，我们希望学院的建设能主要依靠学员和志愿者一砖一瓦的进行，虽然可能没有高楼大厦，可能很慢，但这个过程本身就有很重要的意义——学员们所在的村庄，难道不也需要十二分的耐心，难道不也需要自力更生吗？而对于学院的贡献来说，学员们付出的体力劳动和专家们前来的义务授课又是同样的重要和珍贵。所以，在我们的招生简章上写明——劳动者免费就学！

刚开始时，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有很多的质疑和不同看法：农民难道在家的劳动还不够吗？而恰恰是这个，让我们发现了它的奇妙作用——对于大多数的农民来说，教室是陌生的、代表着权威和只能被动服从的；而田间则是他们的最熟悉，在这里既可以相对自主甚至还容易找回信心。NGO 及现代培训都流行“破冰”，设计各种游戏，希望打破彼此间的陌生感觉。但我们在实践中发现，很多做法可能适合大学生和 NGO 从业人员，却不适合乡土文化影响下的成年农民，因为他们对身体和性别有着太多的禁忌，越在刚开始彼此陌生的情况下越难打破。而田间劳动是否可以成为某种形式的农民“破冰”活动呢？到了田间，分成各个小组，互助劳动，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自然而又自信的边劳动边交流，同时再看看一起劳动的协作者“老师”卖力但蹩脚的样子，在大笑或窃笑中高兴的露一手。

这时，或许我们可以发现：学员之间，学员和“老师”之间的区别已经不再重要，而协作者也有了一次彻底而真实地“被教育”经历。

在合作中学会合作——培训中的情境教育

台湾学者夏晓鹃在高雄市美浓镇创办外籍新娘识字班的时候，希望引入“民众剧场”工作坊的活泼形式，既可能带动识字班原本呆板、制式的气氛，又可能达到打破“沉默文化”并进而“意识觉醒”的目的¹¹，费尽周折总算找到了一个没有桌椅的木地板教室，组织者很兴奋地设想着这些来自东南亚的外籍新娘们将通过身体的解放和在拉美很流行的“民众剧场”教育形式来完成原定的目标。但经过尝试后，组织者却未能如愿以偿，因为“外籍新娘”难以接受，纵使她们也觉得好玩，但却私下说，“小孩子才玩这种游戏。为了学中文，她们请家人带孩子，她们不是来玩的！”¹² 在她们的眼里，这些让用心良苦的游戏，对于好不容易挤出时间的她们来说是一种多么的奢侈和不应该。原来学习已变成一件残酷的事情，特别是对被边缘者而言。对她们来说，识字班的用意不是习知自我、发展创造力，而是用来熟

¹¹ 夏晓鹃，2002，《流离寻岸——资本国际化下的“外籍新娘”现象》，台湾社会研究丛刊—09，第201页

¹² 同上，第202页

习技能、提升竞争力。这样的现象，与拉丁美洲受压迫农民的“双重性”一致，即受压迫者同时具有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性质。而“外籍新娘”们也已内化了压迫者意识，以此成为观看自身以及其他受压迫者的视角。¹³

于是，组织者们认真地进行总结和反思，原来的做法是否还是以我们原有的想象，来设计“被教育者”的需要或“可能的喜欢”，这或许正是知识分子抽象思考的偏执和问题所在。于是他们调整了做法，不是彻底的打破、而是逐步和部分的引入新的教学形式。更为关键的是，组织者从她们生活的点滴切入，发现她们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困难和需求，并与她们个人和在地的问题紧密联结¹⁴，而在内容扣联生活的过程中，再结合“民众剧场”关于打破“剧本—真实生活”、“演员—观众”等传统限制性因素的做法，进而发展出一种让学员参与的情境教育。因为这种方式有了与她们相关的具体内容，也有了明确的目标——引出实际的困难，发现真实的问题，大家分享讨论具体的解决办法，促进学员之间彼此隔膜的消除和互助关系的形成。于是，“识字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而我们也从类似的困境中得出同样的经验——在培训中嫁接情境教育。虽然我们对传统的“教—学”形式进行了批判，但对于已经对“正常的学习”有了很深的认同和习惯（这种认同可能来自学员们年轻时所受的教育经历、传统及外界的影响，也可能来自其对子女要求的反作用）的农民学员来说，短时间内让他完全接受是不大现实的，所以我们只能融入一些新的教学方法。

对比高等教育，一门课可能要上一个学期，先有概论，然后再一点点展开，最后总结。受农活和家庭的限制，农民们通常只能抽出1—2周的时间参加集中学习，不可能接受系统的分析，这也不是他们的习惯。所以，需要找到一个（或几个）具体的问题、经验教训及可能的解决办法，从不同的角度去揭示、说明和分析。同时不断地回顾和总结（每天培训开始时，都会安排学习小组带领大家回顾总结前一天的学习内容和心得），在强化中让农民进一步理解并能结合到自己的具体问题及后续行动中。而情境教育正成为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帮助农民巩固并参与学习的有效形式。

在《流离寻岸——资本国际化下的“外籍新娘”现象》一书中，夏晓鹃博士援引Hope和Timmel两人在1984年提出的一套系统的成人教育方法，其中藉由“通关密语”（Code）的使用，将小组聚焦于所欲探讨之问题，并引发热烈的讨论。而“通关密语”意味着，藉由适当的媒介以激发出后续的讨论及行动。媒介可以是图片、短剧、或其他形式，但必须具备七

¹³ 同上，第202页

¹⁴ 同上，第204页

个条件：1、处理社群感受最强烈的议题；2、呈现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的景象；3、运用对比或行动以唤起意识或问题；4、只聚焦在一个主题，使能深入讨论问题；5、简单、清楚、易见；6、避免干扰的细节，特别是主题外的人事物；7、激起兴趣，并触及小组成员的心灵。讨论分为六个步骤：1、“通关密语”的描述——从中看到了什么？；2、初步分析——他们为什么这么做？3、现实生活——现实生活中也有类似的事吗？4、相关问题——和哪些问题有关？5、问题根源——如何分析？6、行动计划——怎么办？¹⁵

虽然之前没有听说过这一理论，但我们培训中的一些做法无疑正是对之进行的全面实践。对于以“农民合作组织”为主题的培训，如果光讲“合作的好处”“如何建立合作组织”，则可能是一种误导，因为学员们将会面临很多方面的困难。但如果只是讲或讨论再多的可能困难，那也都是纸上谈兵，听者还是会像其他知识一样接受，而很难起到预防针的作用。

所以，为了加深学员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和把握。提高实际操作能力，避免合作组织发展过程中一些常见的失误。同时也是检验学员学习效果，及时调整巩固教学内容。寓教于乐、轻松活泼，增进学员之间、学员与协作者之间的交流与参与程度，进而形成一种对话的机制和学员之间互助的办法。我们将农民合作组织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解决办法，设计成了一种“模拟—互动”的形式。希望将其中的重点、难点以具体场景表现出来。具体做法如下：

- 1、选定一定学员（可适当包括协作者）为指定角色，扮演合作社成立过程中的各种场景和遇到的问题。为增加参与，角色可根据观众的要求而替换。
- 2、模拟时，选出观察小组，重点观察，每个场景结束后发表评论，要求找出其中的错误及好的经验：好在哪里？有哪些失误？实际操作中的困难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
- 3、每个场景结束后全体分别讨论。
- 4、协作者总结点评。

其中可能模拟表现的困难和解决办法如：

- 1、合作社发起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如：村民的疑问——与人民公社的区别？合作社的性质？经济组织还是公益组织？村两委担心——合作社是否合法？是否会造成不稳定？是否要取代村委会？）
- 2、合作社成立后的发展与组织管理（如：理事会内部发生矛盾——部分理事认为付出与得

¹⁵夏晓鹃，2002，《流离寻岸——资本国际化下的“外籍新娘”现象》，台湾社会研究丛刊—09，第217页

到不成正比；理事会与社员矛盾——没有及时让大家见到好处；合作社发起人家庭内部矛盾——耽误自家事，村民背后还有闲言碎语。）

3、合作社收入的分配（如何实现按交易额返还？——交同样的股金，为何大家得到的分红不一样？）与个体户有什么区别？

4、与农资经销商形成竞争，农资经销商压价，怎么办？

……

为了使演出显地真实并富有戏剧性，更好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在不影响主题表现的前提下，还可以设计一些活泼的形式并利用一些道具，如：开场时让两钉子户（不理解合作社原则并唱反调者）拿着空酒瓶在对喝；合作社发起人手上拿着写有“合作社法”字样的纸张以代表真正的法律（可能会被村委质疑是自费印的？），村委会代表比较威严，合作社发起人为了获取支持而主动为其点烟，合作社发起人妻子正在家里扫地忙家务（丈夫接到合作社理事打来电话，要求其去开会，从而激起家庭内部矛盾，合作社妻子一方面抱怨，另一方面向观众表现委屈），农资经销商正在村里吆喝着收购苹果，主动并单独与个别社员谈价格，希望社员将苹果卖给小贩，而不要卖给合作社等等。

类似的模拟通常是在培训接近尾声时，算是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对前面的学习内容进行综合与回顾，同时也检查我们的前期教学效果，以便及时在后面的时间补缺补漏。每一次模拟无疑都把培训推向高潮，“演员们”既“演”的投入，“观众们”也因为不过瘾而纷纷上台去试一试如何可以更好的解决困难。而之所以可以这样，因为那就是他们已经或将要遇到的真实和现实。

通过这些戏剧化的冲突和现场讨论，很多人感受到了合作的困难，但同时有人说：“虽然合作也有各种困难和矛盾，但第一天我们就谈了不合作的痛苦和矛盾，比起来，可能不合作的困难和痛苦要更多更长久。所以我们要去面对这些困难。一步一步来，急不得……”

除经验外，我们也可能从另一方面学到更多的教训。比如有人说：“我们应该在想好做什么后才去组织，而不是组织好了再找事情做，所以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很合适的切入点。在某些不可以合作的地方不要合作，在可以的地方才合作……”、“这事这么难，所以应该严格要求我们自己”、“毕竟这只是困难的练习，而实际上，我们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将会多的。”……

虽然，这样的模拟是我们每一次培训的保留曲目，但彼此间却有很多的差别，因为学员的背景和理解不一样，而这些差别正给下一次的模拟添加了更多新的创意和表现方法。

所以，我们的情境教育，也需要和回乡建设的农民学员一样，见招拆招，灵活机动的解

决问题，并在这个过程中进行自我的反省和调整。

收获与起点——培训给学员带来的

《我只要》¹⁶

作者：刘红军（2005年12月农民培训班河南洛阳籍学员）

.....

步入教员（园）
几幢青砖灰瓦的旧房
纯朴自然，甚至有点脏，有点破
也许配不上我经过的村庄
亲切、温暖、真诚、包容
我们农民就像回到娘家一样
吃过、住过、交流过、学习过
收获到的
比家中粮仓里的麦子还要多

几十号人亲如兄弟姐妹
来自各地，来自全国
出操、喊口号、唱歌
交流、辩论、听课
做家乡主人
先得改变自己
建设新农村
要团结起来，互助合作
.....

《结业联欢会上三句半》¹⁷

作者：2006年八月农民培训班学员集体创作

胡主席领导全中国
一号文件真不错
农民致富怎么做
学习

学习目标细琢磨
没有组织心难过
翻来覆去睡不着
寻找

河北有个晏阳初
乡建培训经验多
学员回去做什么
苦干

今晚联欢节目多
精彩表演乐呵呵
满载而归各奔各
拜拜

这是两首农民学员学习结束后的作品。其中散发出的风趣、朴实和真诚对于已经被习惯而粗暴地安上“愚昧”、“贫困”、“可怜”帽子的农民形象，不啻于无声的讽刺。

正是透过此类作品及学员对培训的评估反馈，我们尝试了解学员对培训的认识、收获和

¹⁶ 选自《乡建通讯（学员版）》2006年，第2期，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编印

¹⁷ 选自《乡建通讯（学员版）》2006年，第4期，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编印

不满意的地方。这样的培训能给学员带去什么？——合作组织的知识/别的地方好的经验或教训/回去后如何开展同样工作……或许都有，但对一个短期培训来说，必然每一个方面都只可能是一小部分。

而透过这些作品以及学员在结业仪式上每个人的最后总结¹⁸，如果培训是个整体，学员们可能更看重什么？

或许是一种感觉和印象——人与人平等相处、互相学习，专家学者、官员教授（除农民外，学员中也有县乡村三级的领导）没有架子，大学生和志愿者谦虚而乐于奉献，整个环境和谐而推崇互相帮助。与自己原来的经历和感受很不一样的这些，让学员们获得了尊重，也在内心里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潜移默化的这些，虽然不好进行量化或评估，但却至为重要，就像传统教育可以将“教育者—被教育者”的权力关系复制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我们也希望传递并再生产着人与人之间这种合作和平等的关系。

或许是一种自信——培训中的一项内容是，清晨七点的学员演讲训练，每人站在讲台前对着全体学员发表3分钟的演讲，既锻炼大家的表达和组织动员能力（将是回乡后推动合作组织发展的基本功），同时演讲内容正与培训的其他部分相呼应。在一次“我的梦想”主题演讲中，由于第一次上台，有位学员很紧张，憋了半天说不出来，最后说“我昨晚梦见，家里老母鸡下了一个蛋……”自然引起大家的一阵哄笑。而正是这一次尴尬的挑战，这位学员不断的放开自己，在培训后期，就能相对流利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和这位学员一样，培训中很多互动环节的设计让学员有更多参与的机会，分享自己的故事、经验和感受将可能获得鼓励和肯定，在看到别的学员变化时也看到了自己的变化，自信心和从改变自己开始的有力感也在慢慢的增强。

或许是平台和桥梁的作用——培训创造了一个让各地对发展合作经济抱有热情兴趣的农民可以交流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他们可以自由地交换信息，分享故事。在培训的中午休息时间，农民学员很多没有午休习惯，所以我们提供了一些场地，让学员自我组织、自由地安排一些活动。如主题辩论、主题讨论（学员自由报名）、光盘放映（有些是学员自带的介绍自己（组织）的光盘）、交换市场信息。而有些收获（如原来不认识的同地区学员，互相交换良种信息，并在回乡后引种成功）更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或许是一个新的起点——培训是为了能有更多建设行动的出现，而短期培训只是行动的开始。学院将为每个学员建立专门的档案，并跟进具体的后续支持计划，鼓励学员返乡后以

¹⁸ 详见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历次培训记录

不同的方式开展行动。

而在学员培训后所推动的合作组织过程中，通常会遭遇大量的困难和问题，希望得到外界的支持和指导。学院将一部分学员创办经营的合作组织视为试点，为这些试点提供免费培训骨干的机会（为每个点同时提供2—3个名额，让他们以团队形式过来，既是培训，也是促进这些骨干的磨合）、资金支持、信息服务（定期免费邮寄《乡建通讯》及合作社资料汇编）和咨询等。对一些处于起步阶段的合作组织，学院还出资在当地举办合作经济培训，以促进试点组织管理团队的建设和社会对合作经济认识的总体提高。¹⁹

在这个过程中，学院也将与这些试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起步到发展，通过他们自己的反馈和学院组织人前往调研，积累不同类型的农民合作组织发展案例及经验。由于是以学员这种特殊关系进行切入的，我们可以较少担心掉入被依赖的陷阱。正是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我们既希望试点组织可以更多地依靠本土资源逐步发展，同时希望还能收集到不同类型但却是原生态的案例。

总之，我们的培训周期不是培训本身的7—10天，而是包括“培训—推动学员开展后续行动—为新组织提供更多的培训（部分骨干到学院和学院到所在地对全体社员进行培训这两种形式相结合）—组织经验交流会，已行动起来的试验点交流经验教训（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内的整体过程。

三年培训中，有很多的学员送给我们锦旗和牌匾，但我们最为喜欢和珍惜的是2004年学院院庆一周年时，山西运城农民送来写有“中国农民的娘家”字样的木排。这与其说是对我们的赞扬，不如说是对我们过高的要求和期待。它让我们得到莫大的鼓舞，也使我们诚惶诚恐——或许，只有让更多的志愿者、关心“三农”的专家学者和有建设家乡决心的农民朋友都参与进来，才可能共同搭好这个平台。

¹⁹ 周锦宇，《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合作经济工作总结及大事记》

西部支教日记（四）

周忆粟

如果不是自己做，很多事情不明白

这个想法是我在捐献的那批电脑来了以后逐渐发现的。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是，上海上午一家台资企业成美公司送给我们学校的一台激光打印机，最后很有可能沦为摆设。（并非机器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学校用不起。先不说硒鼓充粉要花钱，最简单的一点是，纸张就是一个问题。

对于学校来说，以前都是用那种很薄的黄黄的纸（我也说不好是什么纸），这种纸质量低劣，用油印经常会化开。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在于便宜！你简直找不到更便宜的纸了，一大张 B4 的纸不过 1 分钱。但是对于激光打印机来说，这纸不行，首先送纸器就没法把它送进去，因为太薄，其次，即便能用，却打不出任何内容。据修理的人说，是这纸无法附着墨粉（我不是很懂，也不晓得是否真的这样）。但是确定的一点是，只有用那种白色的比较厚的复印纸才可能。可是整个学校这种纸才 1 叠！因为对于农村学校来说，十几块钱一包的打印纸，简直是一种奢侈品。那些在大城市中随意供人使用的纸张，在这里成为了珍稀物品，这可是没有来过的人不会知道的。其次，即便能打，但是那台 HP 的 Laser Jet 5L，只能打印小幅面的纸张，对于试卷那种大小的也无能为力。所以最后，我想它可能只是变成了打印学校重要文档的家伙吧！

所以我在想，学校需要的，是那种稍微带一点自动化的，打印质量很低的设备。

第二点是关于计算机的，除了机器本身的使用以外，老师观念的改变也很重要。比方说，因为来了新的电脑，现在可以做到每个孩子一台机器了。于是课表就要重新安排。因为一周中，可以上课的时间是 5 天×7 节=35 节课，而全校有 17 个班级，每班每周 2 节课，就有 2×17=34 节课。机房又只有一个，于是这样只能机房从早开到晚，每节课几乎都有学生上课。这样的话，课表就要重新安排。于是有老师就有意见了。因为他们觉得语数外这样的主课更重要，放到下午上效果不好（学生比较瞌睡），而电脑课一不考试二不验收，上了有什么用呢？而我自己的担心在于，每天这样开电脑，学校的电费开支是否受得了。校长是电脑教育的积极倡导者（这点我非常赞赏），但是他也必须面对现实，那就是这些电费，可能会让他很头痛。根据我的了解，学校现在经济情况不好，今年冬季的取暖用煤，还是校长赊帐

弄来的,那些电费会否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这恐怕也是当初温世仁先生和林光信先生倡导千乡万才理念的时候所意想不到的,竟然还有付不起电费的学校!要知道,这些可都是国家应该做的啊!

话题回到老师们的态度。我觉得我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多和老师们交流。的确,电脑教育并不是考试项目,它的作用不会体现在分数上。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对于农村的大部分孩子来说,他们将来是无法升学的。即使如我们的学校是这里最好的,去年近300考生,只有40来个进了好高中,其他人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难道我们的教育就是为这40人办的吗?显然不是,我们必须了解到,对于孩子的长期成长,我们不能只着眼于考试和升学。从人的发展的角度来看,他们这代学生,如果无法搭上信息化的列车,那么他们今后和城里孩子之间的“数字鸿沟”是无法被弥补的。通过电脑教育,或者说信息教育,我们所传导的不仅仅是考试技能,而是传授一种新时代的生活方式。而这种方式,与你在城市还是农村无关。我们也许无法在短期内消除经济上的差距,但是我们可以给孩子们提供了解/认识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在物质资源极其匮乏的农村,只有通过网络和电脑才能达成。在今天的中国,即便是最偏远的县城,都可以找到网吧。但是网吧仅仅是人们娱乐的场所而已。为什么它不能成为获取知识和信息的场所呢?我觉得只要有合适的引导,是完全可以达成的。我们可以告诉孩子们,如何在网上与别人取得联系(比如IM聊天),我们可以告诉他们如何找到自己需要的知识(比如各种新闻网站和维基百科wiki),还能够教给他们如何进行团队合作(比如合作制作一张网页),如何发掘自身的优点和潜力。这些都是普通的课堂教育中无法达成,但是有了电脑和网络,却并非难事。电脑是一个工具,更是一个平台,它提供给学生们一个更广阔的空间。

写完这些,我发现它已经不仅仅是说给老师听的道理,更是我自己思索千乡万才这个理念在实际贯彻中的意义的一个过程。那些对于我们城市中的人来说看起来是想当然的事情,对于西部的孩子们,还可以有如此重大的意义。这就是我自己在实践中的收获。

想看什么书?

昨天下午的计算机课,我没有让我们班上的孩子去上机,在教室里随便扯了个理由(不负责任的表现,哈),然后和他们侃了一节课。最后,为了满足一下自己小小的好奇心,我让他们每人写个纸条,告诉我想看什么书。因为之前《少女》杂志给我寄来的那些书,我都

给了他们班主任，没想到，才半天，就给他们全部借完了。还有很多人跑来问我借书。于是引起了我的好奇。再说反正是自己的班级，说话也比较方便，他们都听我的。

结果很有意思，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他们的纸条上写了“四大名著”（还有写“四大明主的”）。我说，那些古书你们能看懂吗？他们竟然都能！我真不知道现在的语文教育到底把那些书吹到什么地步了，呵呵。还有一半以上的人写了“童话书”或者“童话大王”，这和孩子的天性很符合。接下来的有故事书、历史书、破案书、十万个为什么、还有科普读物。

在课堂里，让孩子们写下他们喜欢的图书的时候，看着他们一张张认真的脸，我挺感动的。3年以后，坐在这里的孩子，能够上高中的，可能一半都不到。我在课堂上所说的那些知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也许再也没有用了。但是如果引起了他们看书的兴趣，那他们将受用一辈子。就凭这点，我也要想办法去多弄点书来。捐赠的图书无法保证一定有我需要的，我想接下来可能自己花钱买一点以及从这个博克上募捐。

我的财力有限，我会把目标主要盯在当当和卓越的那些打折图书上（特别是那些1~3折的图书），以及孔夫子这样的二手旧书店。同时，如果各位读者们，你们有我上面所提到的图书，并且它们对你可能没有什么用的话，请把它们也捐给我吧。

农村教育面临的政策问题

在《中国农村教育政策分析》一文（高书国，载于《中国公共政策分析 2005 年卷》）中，作者总结了六点我们国家在农村基础教育政策上所存在的不足，现摘录于下，并针对第一点讲一下我自己的体会和看法。

第一，农村教育的功能定位不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传统农村教育被简单化为“农业教育”，即直接为第一产业培养人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使农村教育需求发生了根本变化，现有的农村教育的功能、作用和培养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人口结构变化和人口文化素质提高的新要求，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农村教育不但要承担为农业产业培养人才的功能，更要承担人口转移服务、提高人口文化素质和农民职业能力的功能。

我认为“农村教育需求”确实发生了变化，但是发生变化的原因我却不完全同意作者的观点。首先很明显的一点就是，所谓的“农业教育”现在还存在吗？我不知道农业教育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没有见过。不知道“为第一产业培养人才”是培养农业人才吗？从字面上

理解好像是这样的。但是就我在这儿的学校所看到这是一所典型的农村中学。这里并没有一点点“农业”教育的影子。如果说这个学校和城市的学校在硬件上存在差异，那么他们在办学的目标和要求上却是一致的，那就是为高等教育输送人才。而且就我的了解，这并非这里的特殊情形，全国哪所中学不是这样的呢？中考和高考是一个终极目标（虽然我们都知道它不应该是这样）如果说在我的认知中，“农业”教育是指为了应用到农业中去展开的教育，那么现在这里所进行的教学，则完全是为了考试。我在班上做过调查，90%的农村孩子现在不知道怎么进行农业活动。他们不会种地，不知道时令，不晓得可以种什么。我也就这个问题在学校的老师之间进行过求证。上至校长的孩子，下到教务主任、普通老师的孩子们都是一样。同样，他们的家长也不希望他们学会种地。因为他们清楚，种地没有出路，赚不了钱。所以在孩子的成长期刻意不让他们下地。许多十几二十岁的农村青年没有一点农业常识（比方学校的年轻老师）。只要是家境稍微好一点的就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走这条路。相反，农活只有那些家庭情况不怎么好的孩子会做。因为生活所迫，他们不得不早早地和父母一起劳作。这不知道算不算一种讽刺呢？

对于绝大多数的农村孩子来说他们处于一种中间状态。一方面，他们的生活是完全的农业社会，他们的社交圈，他们的朋友、家人、成长的环境无不如此。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在学校学习的知识却又是和他们的生活脱离的。在学校的课本上的那些东西，是为了能够帮助他们中的一些人脱离农村的生活融入城市。但是农村教育的尴尬恰恰在于，绝大多数的学童无法通过这种选拔。那么，在学校学习的这些知识对于他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不想说这是完全的“无用”，但是起码，这些课本上的内容，与他们将来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如果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最后仍然要回到这个生他们养他们的农村，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反思，究竟怎样的“农村教育”是我们应该给他们的？

学校所传授的除了一些作为现代人必须的知识以外（比如读写的能力，算术，以及生物、地理、历史等等），是不是可以再增加一些和他们生活贴切相关的内容呢？比如认识他们的家乡，认识他们的父母每日所从事的工作，认识“农村”究竟是怎样的。如果说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中“农村”总是作为劣“城市”一等存在的话，那么我们的教育就是要向孩子们还原他们生活的真实面貌。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的生活的，同时还必须传授一些必要的职业技能比方对于那些初三毕业而无法升学的孩子们。不管是农业上的还是为他们今后进城所做的准备。学校不应该是一台抽水机，只把最好的送到城市，学校还必须肩负起培养广大的农村建设者的任务。

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一件小事

我觉得到了学校以后很锻炼我的一点就是，很多事情我被迫去自己做决定。以前总是别人能代我做就做，自己能躲则躲，但是在这里，并没有能够依靠的人。时常也发觉自己的社会经验实在太少。

昨天晚上在房间里给学生出期中考试的复习资料。龙龙回来说他给班上的学生印了一套题，准备做个测验。我问他哪去印的。他说在镇高中那里，1毛钱一张8开的大卷子（还能正反两面都印）两个班级140个人，他自己掏了14块钱。我说好啊，我也正在出卷子呢。上次学校的油印机打印质量实在太差，我再也不想用了。宁可花点钱，图个方便。而且十块钱，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负担。正想着星期几去印呢，同事涛涛来了。他说如果去阎村的话只要7分就能印一张。还答应如果我有需要，他可以代劳。不过他问了一句“谁出钱？”

“当然是我自己啊。”

他说，那就是你不对了，你要问学生收钱，而不能自己掏钱。我奇怪了，我自己愿意出钱，为什么还要学生掏呢？

他说，如果你掏了这次的钱，下次别的老师也要给他们出卷子，要他们出钱，学生会怎么想？这点钱对你可能不多，但是不能每个老师都免费给学生印卷子啊。他们总是会收钱的。这样一来，学生心里就会有想法。为什么这个老师收钱那个老师不收钱。他们就会觉得这个老师好，那个老师不好。学生是不会把话藏在心里的，如果表现出来给老师看到了，其它老师会怎么想呢？你只在这里待一年，你对学生好，那你走了以后，他们对于以后的老师会有什么想法呢？

我越听他的话越觉得好像是我自己做错了。但是我以前从未想过，自己的好心（这次是纯粹我自己掏钱啊）也可能带来不好的后果。龙龙也越发觉得他不收钱的举动好像欠妥，而且毕竟他是这里的专职教师和其它的老师低头不见抬头见。那我们究竟错在哪里呢？我说不清楚，但是朦胧地觉得，这是把简单的个人行为放到一个更大的环境中去以后所产生的。毕竟我做事，受众是学生，而他们会想、会思考、会比较。面对其它的老师，会体现出自己的好恶，虽然这种评判是“公平”的，但是一旦我提高了对待他们的标准，那么其他老师除了跟进之外，就没有办法，不然就会被认为“不好”，我不知道这在人际关系中叫什么，但是起码，这让我以后做事的时候多考虑一点。

贼来了

上周末，学校的西边（我住东边）的老师宿舍被盗了。时间是星期五的晚上，西面房子的老师基本都回家了。贼是这样进来的。首先是从草场上把围墙挖了一个大洞，然后钻进来，然后在操场围墙的另一边也挖了个洞，通向老师的宿舍。最匪夷所思的，就是虽然每个老师的窗子上都有铁栏杆。但是不知道被那些贼用什么方法硬生生地把栏杆拉开，然后他们钻过去，破窗而入。幸而没有很大的损失。贼在房子里喝了一杯水，吃了半根麻花，抽了根烟以后，用同样的方法闯入另外一件房间，最后扬长而去。

这已经不是学校第一次遭贼了。去年也有贼用相同的方法闯入学校，不过没有入室。他们把老师们晚上停在外面的摩托车都偷走了。一共损失了3辆（都是三位主任的），在偷最后一辆的时候（是校长的车），不慎触动了警报。被惊醒的老师发现，于是他们落荒而逃。其实最后他们都快要成功了。校长的车已经被他们拉到了公路边上。但是因为太重，没有抬出去，反而弄响了警报。

于是从今年开始，晚上没有人再敢把摩托放在房子外面了。

昨天晚上的教师会议上校长是这么说的：那些闯入学校的贼，就可以认为是凶手、匪徒。老师们不要手软，出了人命由我负责。如果你们因此进去了，我一定把你们弄出来，我自己进去！并且要求所有的值周老师周末住校，每天晚上组织巡夜（也就是睡前而已）。

我是不是也要弄个什么防身的东西呢？

难以言表



班主任为教训不守纪律的学生，打断的笤帚把。

教学笔记 12

有学生问我说记不住单词怎么办,我就把背 GRE 单词的时候看来的杨鹏的方法对他们说了。事后想想,这些农村孩子面对英语单词的境遇到真的和我那时候背 GRE 很像。

就我自己的经验,好像学英语以后就没怎么背过单词。特别是对在学校学的那些单词。好像只有在小学刚刚入门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每天背诵单词,但是后来的学习过程中,基本上只是看一遍就能记住。我一直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小时候对那些《小主人报》上愁眉苦脸地想法记住单词的人总是不理解。我真正面对的单词挑战是从 GRE 开始。TOEFL 的单词虽然花了比较多的时间(一个多月),但是现在我还是可以记住大部分。不过 GRE 是完全另外一种情况。

之所以我说这些孩子们学习英语的情况和我背 GRE 有相像之处,是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缺乏根本的语言环境。除了每天的 45 分钟课堂以外,他们并没有其他的机会来接触英语。就我自己的感觉,英语除了作为一门语言以外,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文化的英语。但是这种文化对于连城市生活都很隔膜的农村孩子,究竟用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理解呢?比方说我今天教了 hamburger 这个单词,但是他们就不理解那是什么,对于他们来说,这只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汉堡”,尽管我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们吃的“肉夹馍”,他们还是似懂非懂。更进一步,没有形象思维的依托,这个单词对于他们只是一串毫无任何规律的字母组合,因为他们连音标都不认识啊!(说到音标,我准备在假期给他们中的一些补习音标)。而 hamburger 这个单词,对于城市中那些经常出入于麦当劳和肯德基的孩子来说,就明明白白地写在每一个汉堡的包装纸上,吃在他们的嘴里,学校的学习加上日常生活的经验,可以让他们不费力地记住这些。

同样对于我的 GRE 学习来说,那些单词离我的生活太远了(也有近的,不过毕竟是少数)与那些复杂拗口晦涩的书面语言相比,我的日常经验无法给我提供太多的帮助。记忆单词不是一个机械的过程,我相信它要和使用、理解、对照结合在一起。可是以学术论文为主要载体的 GRE 显然无法为我提供运用这些方法的场合。所以我和班上的孩子们一样,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死记硬背。

事实上,我就是这么和孩子们说的。因为我实在想不出太好的方法(在教音标之前)。今天早上的早读课,我向他们介绍了爱宾浩斯记忆曲线(虽然我自己有时候也怀疑这个,毕竟这只是个经验公式),以此为引子,向他们说明了,记忆单词要“少量多次”——这不就是我的经验吗?我让孩子们把每天的时间分成 3~4 部分,每次不要超过 20 分钟,这是

考虑到他们能够集中精神的时限大概就是这么点了。然后通过多次反复，来记住这些拼写。看着孩子们把我的话当成救命稻草一样的表情，我自己的心里是很复杂的。因为就我自己的 GRE 实践过程来看并不顺利。很多时候都是前背后忘，VERBAL370 也能说明我实在不是个很好的考生。

但是孩子们所学的单词毕竟简单。虽然我无法证实是不是在他们眼里这些单词就和 GRE 对我是一样，不过我想，毕竟那些词汇大都是和日常生活有关（即便不是他们的生活），即使依靠联想，也能够多少获得一些帮助吧。

无助

和龙龙谈话时常会让我觉得无助。他向我提出了太多的问题，我常常不能给他解释，这大概就是无助的来源。

昨天晚上说到了最近他要参加的教师资格证的考试。对他一样的许多年轻老师来说，因为是师专毕业，相当于中专，只有小学教师资格证。而为了将来的发展，比如说评职称（这也是提高收入的重要途径），必须要取得初中教师资格证。这样他就得再去参加一次考试。其实作为师范院校的毕业生，我知道对于一个大本的师范学生来说，教师资格证是多么好拿。一般来说只要学过教育心理学，参加普通话考试，有一定时间的实际经验，还有一门什么课，名字我记不起来。然后付几十块的工本费，就可以拿到一张。但是对于很多农村的老师，这却可能是一道难过的坎。

他首先置疑了教师资格考试的有效性。特别是教育心理学，比方说让你回答某某年谁创建了某个实验室啊，谁谁谁发明某种理论。难道知道了这些就能成为一个好老师吗？在他看来，应该有更多的实际案例分析，而减少这些概念性的考点。因为作为一个老师，更有用的是对于实际情况的运用分析和掌握，而非死读课本。我对他说，其实何尝仅仅是你们老师这个行当呢，哪个国内的考试不是这样的呢？我知道他说的有道理，但是我却不知道岔子出在了哪里。

然后他又讲了实际的情况，参加考试要 100 多块，还强制你参加培训，又是 100 多，加上其它那些费用，一个人怎么也要 300。他说我现在身边只有 200 多块钱啦。要是这个月工资再不来，只能借钱了。其实钱的问题不是最主要的，主要的是他经常由各种的问题而引发的对未来的茫然和无助。他说现在最后悔的事情就是交了女朋友。以前一个人，再怎么样也是自己扛着，但是现在还要想到她，自己怎么也找不出退缩的理由。

他曾经对我说过很多次，如果考试考不过，他就离开学校，甚至离开镇子和渭南。我以前对他说起过千乡万才在南方的西才东用项目，他问我能不能把他介绍去呢？

我不知道在他身上的生活压力究竟到怎样的地步，因为他经常回避这个话题。但是我可以感觉到，尽管年龄比我小，但是每天在他轻快的表情之下，夜晚的他总是被许多问题所困扰。我一直很想帮助他，可是虽然我能说出很多安慰人的话，却找不到一条可以帮助他摆脱生活困境的道路。像他这样优秀的人，理应得到更大的发展机会，可现在却在学校里慢慢累积着各种痛苦和不堪。好比他的工资，永远养不起一个家和一个孩子。

有时候我是一个心肠很硬的人，我会觉得“自己不努力，再怎样都是自己的不对”。但是在这里我又发现，这个社会中大多数人注定不可能有逆境中奋起的毅力。但是难道他们就没有权利过一般意义上的幸福生活吗？或许我们应该看见，在起点的地方生活就是不公平的，那么面对他们的现状，我们凭什么要用自己的标准来要求他们？

于是我转而相信，人缺少的是机会，机会可以造就人的性格。我们要给每个人更多的机会和选择，这个社会才会变得更公平。

但这一切只是“应该”，我该如何帮助这个每天和我生活在一起的人呢？或许以后我可以为他组装一台电脑（哪怕是二手的，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或许我可以为他介绍一个工作，从而使他离开这个僵化的体制。但是现在，我无能为力。何况是面对着像他那样千千万万的年轻老师！

前天涛涛问我，我究竟准备在这里待多久，我回答说是一年。他说，你不应该在这里那么久。他说我知道你是完全出自想帮助西部的教育来到这里，但是作为一个老师，你最多就照亮那么一点学生（他做了个手势），但是如果你能够出国再回来，你能做的就是照亮整个西部的学生。我听了差点没难过得当场哭出来。

他的无助也是我的无助，心急如焚。

满是错别字的作文

这篇作文是3班的一个孩子写的，对说明现在学生的语文水平很有代表性。正好写的是关于那天计算机课上他们和小朱发生冲突的事情：



“到了中午上第一节课的时候是计算机课，计算机上了伴#课，老师（注，这里应该是朱老师，而非我）说叫我们班抄题，我们班的同学×说坑义坑义，忽然老师从一班走到我们班，请见我们班的刘大朋还有刘沙还有很多的同学在说坑义坑义，老师把气的立课走了出去，还送你们班的课我不教（错别字）了。那时堆郭老师正好从我们班走了过去，给我们的班主任去说了，把我们班的班主任气得把刘大朋和刘沙打了一顿……”

这就是农村语文课的现状，一些孩子到了初一，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满篇都是错别字。写的作文根本没有办法看。几乎都不通。字到是其次，但是他们的思维无法得到锻炼，没有办法很好的叙述一件事情。这对于以后的学习是很大的障碍。

阅卷结束

刚刚结束两个多小时的阅卷过程。还没有来得及休息，老师们就兴致高昂地开始统计每个班的成绩。大家在批阅的过程里面多少都知道孩子们答题的情况，所以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最后的结果是，全年级 400 多个学生，一共及格了 15 人。其中 4 班最多，5 人，其次是 3 班，1 班和我们 6 班，各 3 人，2 班一人，5 班没有。全年级成绩最好的学生是 4 班的 NS，79 分（满分 100），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是 5 班英语老师 N 老师的儿子……按照老师的话说，基因好没办法。其次我们班的 JYX 同学拿到了 78 分。

看着这些满目疮痍的卷子，实在让我难受。一个 70 多人的班级，总共才 3 人及格。其它大多数人都是 30 分以下的成绩。而且，其中两个成绩好的还是去年的留级生。他们本来学的就不赖，我也没花太多的功夫去教他们。倒是其它的几个孩子，学习很努力，却只有 30、40 分的。让我怎么跟他们交待呢。真是伤脑筋。

刚开始阅卷的时候，听初二的老师说他们一共及格了 40 个学生。初三一共及格了 50 左右。还觉得不可思议。没想到轮到我们初一，竟然只有 20 个不到。大家都说这也太打击孩子们的积极性了。不过谁也没办法改变这个事实。考试就是这样的，唯一能够做的就是适应它。虽然我一直在质疑现在这样教育的正当性。

接下来要想办法提高分数了。

难受的周末

度过了一个不十分好受的周末。

最痛苦的是感冒的侵袭，先是嗓子疼，然后伴有轻微的头疼，没有食欲，再开始流鼻涕。星期六的时候在房间里总觉得冷，把炉子烧着了又充满了煤气的味道，让我头晕。无奈只好把窗全部打开，把炉子开到最旺让它完全燃烧。虽然煤烧得快点，起码不至于一氧化碳中毒。但是尽管温度上升了，头脑却丝毫不见好转。逻辑思维还是时灵时不灵，最讨厌的是完全没有表达的欲望。什么都不想写。躺在床上半梦半醒之间读卡尔维诺，他又是个特别喜欢拐弯抹角的家伙，这样也好，打发打发时间。

从把学生试卷拿到手，心里就不是特别舒服。因为我们班的语文、数学、政治都是全年级第一（平均分），唯独英语，倒数第二。让我的脸颇挂不住。所以最近看见他们班主任的

时候都灰溜溜地走开。没办法，底气不足。一直在想为什么，想着想着竟然有点绝望，是不是他们就教不好呢？还是我水平太差？然后不断给自己找毛病，越想越不好受。好像我天生就不是当老师的料。后半周的时候自己身体不舒服，然后上课学生又特别闹，我扯着嗓子训了几个人，但是不见效，反而回来了嗓子更疼。龙龙以前说要让孩子对老师“敬畏”，得又敬又畏。我这个人没有架子，平时自己又随便惯了。有时候和学生讲话也没个正经。他们都习以为常，对我丝毫没有惧怕的心理。导致现在上课经常控制不住。想做个懒散的人还真难。我想，是不是只有“严师”才是当老师的真理呢？

星期六进了一趟城。很多人听见我说“进城”总觉得挺好玩的。也难怪，学校附近包括镇上毕竟物资不如城里丰富。进城主要是采购些吃的东西，还有报纸什么的。这次还去买了点药。在镇上是买不到报纸的。不过那天在肯德基的时候给学校的老师看见了，回来还给他们笑话了一顿。其实我也不是喜欢吃那玩意，不过起码可以保证吃了不拉肚子。

现在每天里三层外三层的裹了好多。也顾不上什么形象了，保暖最重要，只要不冷，其他啥都好说。就像网友说的那样，南方人去了北方，冬天真是挺难捱的，特别是没有暖气的农村的冬天。可是这里的孩子们很多都只穿着薄毛衣，外面一件单衣外套。我问过好些个学生，他们都不冷。龙龙讲，他以前也是这样，只有年纪大了才逐渐越穿越多。我看过学校住宿生的寝室，下次一定拍照片给大家看。我无法想像这样的房间竟然还能住人。他们也竟然都受得住！那天看了一篇文章说贵州的学校，很多的女孩子都有肺炎，因为冬天的晚上睡在没有取暖的房子里，不知道我们学校的学生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

星期天早晨把积攒的作业全部改了。把网友寄给我的《科幻世界》和童话书都编号入册，方便以后借阅。中午借隔壁老师的洗衣机洗了衣服。忘记买橡胶手套了，只好烧了壶热水掺在里面洗。冬天的井水冷得很。哆哆嗦嗦地把衣服都洗好，甩干（这个比较有用），学生已经来了。星期五的时候我答应给班上的几个孩子补课。

可是来的那两个女孩好像一点准备都没有，没有问题，没有做题，我问她们都是一问三不知。坐在那里还嬉笑不停。不知怎么，我的脾气抑制不住的就上来了。头疼得很。批评了她们几句把她们打发走了。但是赶走她们又挺后悔的，因为这不解决问题啊，还是得端正态度。我时常觉得孩子们太小了，听不懂道理。自己好像完全使不上劲一般。

当老师果然是需要技巧的。

这也是一种进步

自从学校得到电脑捐赠，特别是校长拿到唯一的一台笔记本电脑以后，好像全体使用电脑的热情都被调动起来了。校长马上把他原来的那台台式机（奔3, 900, 128mb, 20G）给了别的老师。还为学校的正副领导们都配上了电脑。当然，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很必要的，而非某种官僚主义。因为学校的文档，不管是考试试卷啊，汇报材料啊，都是需要他们来写。现在他们自己有电脑，比先用手写，然后打进去好多了。

我所没有想到的是，校长竟然迷恋上了上网。我说迷恋，是指以前我们要上网（我和其他年轻老师）都得去请校长把ADSL猫打开。但是最近我发现，他常常自己一个人开着门，在很早或者很晚的时候在他的办公室里上网。我对于校长学习新技术的速度表示钦佩。而且他很早地就学会应用电脑作为常规教学手段。那天晚上他让我把物理书（他是一个优秀的物理教师）后面附带的课件光盘给他安装到电脑上。第二天就兴冲冲地拿着电脑，搬了台电视，利用视频输出给孩子们做演示（因为学校没有实验器具）。虽然说利用笔记本的权利还轮不到其他老师，但是起码校长已经体会到了电脑的妙处。

此外，上次与残联打官司的事件，校长在我的帮助下，也学会了利用搜索引擎去网上寻找相关的法律条文或者案例。这也是可喜的。

当然最终电脑还是需要靠人来利用。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学校的很多老师在写材料的时候，开始想到“去网上找找”了。比方说我讲过的物理J老师要完成一篇论文，就让小郭（他又拜托我）给他从网上找参考文章。昨天Y主任也让我在网上给他找找关于“教育教学工作”的文章。我就给他用GOOGLE搜索出了好几篇，他也很满意。昨天中午的时候，校长还让我帮他找“预防突发事故应急预案”。因为以前学校从来没有写过这些东西，不知道应该怎么来弄，所以想从网上下一篇，经过修改以后送上去。

我乐于看见的是，学校领导们开始逐渐认识到网络和电脑的好处。特别是在搜集信息方面，搜索引擎具有无比的优势。他们也开始养成把寻求知识和信息的路径向网络靠拢的习惯，这难道不就是我们这些被互联网养大的孩子所具有的共同点吗？我觉得在很短的时间内教会老师和学生们比方说制作网页啊，或者编程，是不现实的。可是我们能够培养他们依靠网络来获取信息的能力。这样的话，以后不管是学生毕业或者老师的教学工作，都能够帮助他们和外界发生联系（哪怕是单方面的），而不至于成为非常闭塞的人。

房老师心理热线

小房是个很开朗的人，而且颇具有幽默感。之前她给初二音乐课的时候，很多的学生就很崇拜她。虽然现在音乐课不上了，但是经常有不认识的初二学生来找她，还有写信的。居然都是找她倾吐心事的，这让我们和小朱（和小房同宿舍）都赞叹不已。

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心理问题一直是被忽视（起码不被重视）的。以前我上初中的时候，虽然也有心理老师但是好像也没见谁去找过。倒是有时候和某位老师相熟，会找他们去一吐心事，但是也限于偶尔的情况。所以总体来说，我认为自己的青春期过的是颇苦闷的，一方面自己心理早熟，另一方面又苦于父母和朋友没有人理解。所以初中的那几年总体上来说并不能称得上“快乐”。于是我就很好奇，不知道农村的孩子所苦闷的是不是和我以前有相同的内容呢？

小房一般不说这些学生的隐私，因为她觉得人家找她，基本上就是信任她。她不想让我们晓得（或者是让我晓得）是哪些学生找过她。后来在我的再三央求下她告诉了我学生跟她讲的事情，但是还是没说是哪个学生，况且有些学生她也不认识。找她说的都是学校发生的事情。比方讲在班级里不受重视啊（对自己容貌没有自信？），没有朋友说话啊，更多的是同学之间的小矛盾，比方谁谁谁说了谁谁谁的话，导致谁谁谁再也不理谁谁谁了。还有写关于学习的，比方读书读不好，不想读。

总体来说，和我预想的差不多。当然我知道，这种都不是随机案例，无法说明总体情况，而且来找她的，都是有一定的勇气和觉悟的，恐怕更多的孩子有问题还是藏在心里。不过我挺好奇的是，好像没有人找她讲感情的事情。比方说对谁谁谁有好感啊，对方不重视自己等等。难道是以以前我们班上的人都太早熟了吗？还是说现在的小孩迟钝？不过我只听过越来越早熟的……我私下问过一个初三的学生。其实学校里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老师们也没有特别强调过不准谈恋爱。地下情侣（果然哪里都是这样）为数不少。但是好像没有谁碰到感情问题去找老师的，哪怕是一个不熟的老师（这样不会告状）。不知道是他们的感情还不够丰富呢（抱歉武断地这么说）还是真的有自己的方式呢？

挺想做个了解和调查的，不过大概没有学校领导会支持吧。况且我这方面知识也太少了。

我心中的奥运 ——一位中国农民的心里话

京华觅客

*我们做对了什么，人们可能不会记得，
我们做错了什么，人们可能不会忘记。*

引子

奥运会还没有进入倒计时的时候，村子里一些上了岁数的人就开始议论起北京奥运期间社会治安的事了。

他们说最多的事情，恐怕就是查暂住证啦、分单双号啦、“清”外地人了等等一些让人兴奋又忧郁的事。兴奋是因为这些话题是很好的谈资，几乎人人都能插上嘴，忧郁是因为果真如此，那麻烦就不远了。本来对于这样的话题，很多人都已厌倦了，没什么好新鲜的，但因为基于北京奥运会，就显得分外不同，再加上一些人云亦云，虚张声势，空气便陡然地紧张起来。人们的精神和生活在这种氛围中都起了微妙的变化，好像来的不是奥运，而是什么运动和学潮。

对此，我是不屑一顾的。尽管我的邻居极力渲染这种气氛。

然而随着奥运会进入倒计时 100 天，我感到人们的预言真的应验了，而我却失落地被闪到了一边。

下面便是发生在身边的一些具体的事例。

一、一证难求

暂住证制度是我国在进行人口管理和治安管理方面的一个突出产物，从它一经产生到实施，就产生了无数的问题和故事。经过争论、磨合、调价，它已由最初的 180 元 / 年，降到了 5 元 / 年，办证人数也显著提高，派出所和联防部门也由以前的严查改为有事则查，无事就算，于是人们特别是外来人口对它就不那么紧张了，办证成为可有可无的事。

还没进入倒计时时，村里的联防人员就喳喳忽忽地让没证的人赶快办证，说过一段时间就不好办了。人们便真开始忙起来。笔者本人因为给员工办证，便跑到辖区派出所去咨询，到了以后才发现，原本冷清的外来人口办公室这几天一下子热闹起来，一大早就排起了几十

米的长队等在大门口，等待工作人员上班，而且上班以后，一天才办 60 人，上午发 30 个号，下午发 30 个号，不延时，不加班，有些人一连排了好几天还没有拿到号。有几个人为了排队，半夜就来了。我一看人太多，没有戏，就只好回去了，想着过几天再办。等我过几天去办时人虽然少了，但是手续又麻烦了。以前办证，拿着房屋出租证、身份证、合格的像片、5 元钱就给办了。现在为了控制外来人口，必须要房东本人拿着相关证件，亲自找管片民警签字才给办，民警不签字房东不出面也办不了。这一下，有一些二房东可就急了，到处托人说情找民警签字，没有房屋出租证的就更难办了。没办法，我只好找来了房东，在他的担保之下，我才办了一张暂住证，并且用了一周时间，而平常也就几分钟的时间。

暂住证风声过完以后，又有新的通知，派出所要求各个房东在奥运会期间，不能将房子租给那些拾荒的、收废品的、无正式职业的人员，以此来加强本辖区的管理，于是那些经常出现的单车、手推车、平板车和成群结队的淘荒人员便少多了。

二、劳力紧俏

随着奥运会的临近，各大建筑工地陆续接到通知，要求这些工地在七月初到七月二十日之前必须停工休息，让工人放假回家，等到天凉了再让工人回京。言下之意，就是工人要放两三个月假，10 月才能复工。对此大部分工人是有怨言的，对他们来说，奥运会是大事，但挣钱养家糊口也是大事，他们宁可忙着也比闲呆着强。

李红举，河南省长葛县人，2001 年到北京谋生。刚开始养鱼，后来又倒卖汽油，2004 年开始涉足建筑行业。按他的说法 2006 年之前是工人好找，活好找，帐不好结。2006 年以后是工人好找，帐也好结了，但活不好找。自从进入奥运倒行时起，是活好找，帐也好结，但是工人不好找了。原因有二：工人现在要价很高，往往逼近预算；其次，很多民工趁夏收回去，就不打算回京了，先避一避奥运会再说。

奥运会临近，五环内各大工地都接到通知，要求工人在六月底到七月二十日日之间停工放假，许多工地找不到工人，也到处揽人。李红举一连签了三处工地的活，但到目前为止，只有一处正常开工，其它两处都找不到人，就是有人，也因为要价太高，超出预算而做罢。工地天天催他，他能有什么好办法呢？

李运成，湖北孝感人，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工程监理，他们公司在海淀区开发了 8 幢楼的居住小区项目，建设方是北京市城建四公司，该建筑工地在六月五日曾爆发了 500 名工人围攻项目部的讨薪事件，要求老板发工资好回家收麦子。收完麦子以后，工人陆续回来，干了才半个月活，又要放假，他也在琢磨这两个月该做点什么事，总不能闲呆着吧，可干什么，

干多久？工地开工了他还要回去，真是两难啊！

三、 重见天日

地下室的停业，是在整顿通知下发以后听说的，只是没有亲历过，为了调查的全面，我特意拨通了一个人的电话号码，因为他是经营地下室出租生意的。

这个人叫王喜，安徽省金寨县人，起初随父母来北京做粮油生意，后来又拉黑活，再后来和别人合伙承包地下室出租。目前他在朝阳区白家楼和丰台区张仪村各有 1600 平方米和 1500 平方米的居民楼地下室两处，有大小房间 110 间和 115 间，朝阳区的那处租金 9 万元 / 年，丰台区稍偏一些，租金 6.8 万元 / 年。派出所要求停业三个月，朝阳区那损失近 8.9 万元。而张仪村那里损失也在 7 万元左右。因为和物业签了合同交过了租金，退租不太可能，只能熬着，等奥运会以后，再重新招租。这是二房东王喜的经济帐，而那些在地下室居住的人们则面临更多的不便。

奥运会临近，为了减少城市中心区闲散人员的数量，防止更大范围的人流量，从 6 月初开始，各辖区派出所和城市管理大队就对所辖区的黑旅馆和出租房屋进行地毯式的警告和检查，要求立刻关张或停业，处于地下室内的出租房屋一律关停，不得营业，违者重罚。于是王喜便贴出通知要求承租户们提前找房，暂时不租了。粗算一下，一间地下室平均住 1.5 人，一幢楼 110 间房屋，能住 165 人；北京城五环以内除二环内少量地下室留用外，再除去一些不能住人的，就少算有 3000 幢出租，整个下来，从城区里面将近要走出近 40--50 万人，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物业和房东的损失是明显的，可对于那些房客们，更大的不便要由他们自己承担，他们不得不收拾家当走向五环外或更远的郊区，直到找到住处，对他们来说“重见天日”或许来的早了点吧。

三、 资源卫士

在一般人眼里，废品收购站是废物和脏乱的代名词，而废品收购者是破三轮和力夫的象征。现实与形式的结合，让人们的认识根深蒂固，一声“破烂的卖——”又喊出了多少流浪者的无耐与无聊。

刘沛亮，河南固始县人，在北京刚开始骑三轮车沿街收废品，2001 年在海淀区八家村开货厂（废品收购站）收货（收费品），后来又搬到清河。他花了 8 万元从村里租了 3 亩半地，经过改造、建设，把场地分成 七块，分别租给了另外七家人，自己当起了二房东。在六月十一日，清河派出所要求辖区所有废品收购站的老板到派出所开会，主要议题就是要求

在七月一日之前，所有固定和流动收废品的人员抓紧时间撤离和关停，不要再公开游荡和开张，违者从严处罚。至于居民和百姓的可回收垃圾如何解决，却没有涉及。更为严重的是，为了彻底把他们从村子里“清”走，村委会已通知他，不再和他续合同了，要求他在七月十五日之前全部搬走。这一下，七家摊位老板又来找刘沛亮退租金，他正发愁呢。

当我于七月五日第二次找到刘沛亮的时候，他说他已经在较远的地方找到一块场地，最近就要往那搬，可搬过去也暂时没有生意，因为零散收购者不让走街串巷了，大的收购点就更没货收，这都要等到9月底奥运会结束再说了。“那这两个月租金不是损失了吗？”“损失就损失了，为了奥运会，也只好舍小家，为‘大家’了。”他如是说。

当我问起奥运会期间城市废旧物品如何处理的问题时，他说奥运会之前，北京市政府强行限制非法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进城收废品，要收也可以，必须到北京市海淀区物资回收公司花钱买他们统一定制的汽车才可以，否则不让别的车种收，也不让进城。“多少钱一辆车？”“6万多，有一点像金杯车，但配制不太好，其他费用单交，包括管理费、养路费等。”应该说这也是一个办法，但这样下来，收废品的成本就提高了，利润也就少了一些，他们会买帐吗？

据了解，到目前为止，买这种车的人还不多，仍以机动三轮车为主，他们都在观望着，等待着奥运会结束后形势的发展。有消息说，奥运会以后，为减少城市污染，城里大小的废品收购站都要搬到六环路以外。不知这种规划是否合理，收购者们又愿意吗？高昂的运输费他们能承受吗？看样子，要实现物资回收在形式和管理上的统一，还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

四、 昼伏夜行

这几天，齐小林两口子不得不为门口上的“放假”二字费尽口舌，一遍一遍地解释，一遍一遍地重复，目的就是为掩人耳目，消除误会，让想进浴池洗澡的人放心进来。

齐小林，四川达县人，早些时间来北京无所适事，后来看到别人开浴池比较挣钱，就打算试一试。后来他在村里花了1.8万元/半年租了十几间房子，又花了8万元买设备和装修，于五月一日开始试营业。第一个月还不错，他挣了5000块钱，第二个月就收到派出所的通知，要求无照浴池一律停止经营活动。起初他硬是不关，想着这浴池对人们的卫生和生活有很大帮助的，怎么能说关就关呢，难道这也影响奥运？试想，没有浴池，人们的洗澡成了问题，那才影响奥运呢。但派出所和城管吆喝了两次，他招架不住，只好歇业，并在大门上挂出了“放假”的牌子。后来，客人来洗澡，齐先生在拒绝的同时，才得知周围的两家浴池都

没真正关，所谓“关”只是白天锁门，晚上照常营业，而且时间比往日更长。他脑子开窍，也效仿之。于是白天“放假”应付检查，晚上牌子不摘，站在大门口专门解说，于是便有了前面的一幕。

笔者在他的“旺旺浴池”看到“停业通知”仍然贴在墙上，进进出出的客人还不少，只是没了搓澡工。和他聊天以后得知，近一段时间，因为流动人口少了，客源就自然少了一些，又加上白天不敢营业，晚上才开，收入就更少一些，也就是刚够房租、水、电费而已，不挣什么钱。他担心说不定从哪天起，晚上也不让开了，那才是真正赔钱了。而真有那么一天，这洗澡可成大事了，人们是在家里，还是去浴场？不得而知了。

五、 预约理发

之所以说是预约理发，是我不知该怎样表述这种现象，后来想一想，也就这般叫了，应该还可以。

在一家家理发店的门上，贴着一些纸条，上面写着：*有事请拨打电话 1312××××××，一会儿到；*或者直接写着：*要理发请打电话几儿几，如何如何。*

这是在浴池贴“放假”通知的同时，在理发店门上贴出的奇怪纸条，很显然，他们也收到停业的通知了，但我不得不佩服小老板们的精明与变通，你不让我明着干，我偷着干，又不违法乱纪，这总该可以了吧，总不会让人蓬头垢面迎奥运吧。

小汪是一位腿有残疾的湖北姑娘，理发都要坐着工作，她和男朋友合着开了一家小发廊，凭着态度好，服务周到，技术佳，生意十分红火，每天的顾客络绎不绝，自从下发了停业通知后，她们就这么偷偷干着，有一天算一天，后来看看风声似乎小了点，干脆撕掉纸条开门营业，大家也都纷纷扯去纸条，恢复正常，即便这样，他们也是不踏实的，要真正恢复正常，恐怕还是要等到奥运会之后了，“干一天算一天吧。”小汪哭笑道。

七、市场整顿

随着调查的深入和事件的层出不穷，笔者时时陷入深深的愤慨和忧虑之中，虽然我深爱我们的祖国和人民，但我不得不说：奥运会来了，我们怎么了。

六月十八日早上7点，通州区新华北街西侧的通州西海子市场突遭关停。由于此前市场和商户都未收到通知，突然关门的消息引发了商户的不满和市民的抢购。相关部门在市场张贴的通知上，注明的整顿原因是：周边的治安、环卫、消防、交通、无照经营等问题突出，与通州新城的发展极不适应。虽然300多名商户与政府相关部门进行了谈判，但是关停整顿

是必须的，而且至少两个月，但可以给几天的宽限期，至于改造时商户如何安置，居民们如何买菜，却没有涉及。这是京城一家媒体报道的。

同样是市场，宣武区广安门天陶市场却面临撤市的命运。在本月七月一日那天，市场突然贴出七月二十日停业的通知，要求客户们早做准备。这一决定引起了商户和居民们的强烈不满，他们说市场每天的客流量在一万人左右，广内、牛街、长椿街甚至西单的居民都到这里买菜，市场 120 个摊位，每天上千万斤的蔬菜供应着附近的居民，市场停业后，他们买菜就成了大问题。虽然旁边也有市场，但来回都是不方便的，至于取消这个市场的原因是：附近有两家涉外酒店，市场前大量的自行车、行人和无照商贩影响了周边环境。

胡建桥，安徽砀山人，早年在中关村一带从事电脑配件的批发零售。2004 年在太平洋市场租了两个摊位，主要做主板和内存，由于市场一墙之隔就是北京大学的乒乓球馆——奥运会比赛场馆之一，为了净化该场馆周边环境，这个市场要求从七月二十日——九月二十日停业两个月。而其他几个大型电子市场则正常营业。他担心地说：“这两个月损失是不可避免的，但更担心开业后市场不景气所带来的压力，我们放假了，客户会被不放假的市场挖走，到那时损失会更大，有些人已经开始甩货了。”

八、限行政策

如果说市场整顿是倾向于外来人口和小生意者的话，那么限行政策则是针对整个政府和市民的，乃至整个国民。从长远发展来说，这一政策实施的公平而又公正，笔者之所以提到这一点，只是希望政府办事不要图一时之需，而应图一世之需，在实施细节和规划上既要着眼现在又要兼顾未来，这才不失为明智之举。

从七月二十日开始实施的限行政策，带来了以汽车为主的三大行业高峰：出租汽车业、汽车租赁业和汽车销售业。

张军，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按他的话说：“限行好啊，私家车不让开，出租车又有限，他们的车刚好派上用场，短距离不分单双日，长距离价钱肯定高，你限吧，不影响我们挣钱。”

但在市场内卖粮油的韩师傅却对限行是另一番心情。韩师傅名叫韩宝山，河北沧州人，在海淀区小营农贸市场批发、零售粮油。他反映从七月一日开始，实行黄标车禁行，很多外地运送大米、粮油、面粉的车不让进京，导致大的粮油公司缺少竞争对手，纷纷开始涨价，迫使他们上货后，也加价卖，但是客户和居民们不买帐，纷纷埋怨，大的工地又纷纷放假，送不出去货，这两天他的生意大不如以前。举例来说以前 50 斤清水大米 65 元就可以卖，但加价后，低于 72 元就不卖，涨幅达到 11%。“市场还三天两头检查清理，要求这、要求那，

搞得市场冷清，人心慌慌。”韩师傅埋怨道。

笔者又走访了蔬菜市场，发现这里未涨价，原来市里有规定，凡是为北京运送鲜活农产品的车辆，不论黄标、绿标与否，一律放行，这样就自然平抑了物价。这倒是良性的政策，不知这运送粮油、大米的车何时放宽呢。

其实限行背后更深层问题是交通压力，能源和环境压力。我们不但没有限制汽车制造和买卖汽车，限制私家车的发展，相反，我们却在开足马力奔向“繁荣”。试想三、四十年以后年，随着石油的枯竭，那一辆辆汽车就是一堆堆废铁，后人会做何感想？说到底，北京的空气不是凭单双号就能根本扭转的，你不限制车就不会有多大起色，你限制了车，又担心经济上不去，孰轻孰重，应该不难回答。为了下一个奥运会，更为了长治久安，少买车，少卖车，少开车，少产车才是其中一条出路。

九、明天的早餐在哪里

六月十九日，首都著名媒体京华时报的一篇报道，引起了无数人的关注，更让幼儿园举办者忧虑和担心。

该报宣称：前天，海淀区东升乡政府的一纸限期取缔无照幼儿园的告知书散发到该乡20多家幼儿园园长手中。约2000多名打工人员的子女面临安置难题。笔者找到报道中的王毅园长，他向笔者出示了那份告知书。

内容如下：“为依法切实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保障托幼机构的安全和正常教学秩序，实施规范化管理，确保奥运会期间平安和谐的社会氛围，东升乡（地区）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的有关规定，采取集中整治措施取缔无照经营的托幼园所。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又是奥运会，这奥运会的影响已经无处不在了，明着取缔幼儿园，实际上是让人往外走吗。”王毅说。据他介绍不是他们不想办照，而是办幼儿园营业执照，特别是服务外来务工子弟的幼儿园，几乎是不太可能。首先注册资金需要50万元以上，二是至少需要300平米以上的营业面积，并要求有房产证，而有房产证面积又在300平米的出租房，年租金都在30万元以上，他们根本租不起，就算租起了，这对于每月只能承受300元左右托费的家长来说，他们也上不起，他们只能去那种条件相对简陋，收费低廉的幼儿园。东升乡合法的幼儿园一共不到5家，但对于几十万人口的地区来说，这远不能满足家长的需求，所以便出现20多家无照的小幼儿园。政府解决不了，只有靠他们自己去解决了。

眼看七月二十日的期限马上就要到了，这些园长们的心也日渐紧绷起眯，虽然王毅联合

了十几家幼儿园的园长，给东升乡党委写了一封联名信，要求暂缓对此类幼儿园的关停，但考虑可能会把事态扩大，迟迟不敢递上去。对于他的那百十个孩子，百十个家长，还有其它2000多名孩子，他们的明天会在哪里，他们明天的早餐又会在哪里？这应该不仅仅是几个园长的事了。

十、其它

七月二十日是一个大限，七月二十日是又一个让国人记住的日子，这日子来得让人模棱两可。

为了奥运会这一百年盛事，我们祈盼了许久，在他真正到来之前，我们在五大城市搞如此大的动静，只是为了暂时减少交通（堵车）问题，环境（空气）问题和人口（人流）问题，这里面有多大的必要，多少的浪费，多少的形象工程？我们且不说奥运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影响，多大的商机，多少的利润，我们更应该听一听老百姓的感受和心声，电视媒体里的不一定是真话，我们说的也不一定是假话。总之，在重大事情面前，还是应该提倡毛主席的两句话“解放思想，事实求是”。

至于那么多的服务行业为什么没执照，这是工商行业的事，也是商户们的事，大家可以自己去了解，这里就不累述了。

后记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江，它的名字就叫长江，古老的东方有一条河，它的名字就叫黄河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这首《龙的传人》曾激起多少热血青年的爱国热忱，又曾长久激荡在我的心胸。

当希腊女祭祀在奥林匹克山点燃中国的祥云火炬时，当登山运动员在珠峰峰顶高举奥运火炬时，泪水打湿了我们的胸襟。

当全国在汶川地震的三分钟默哀中停顿时，当天安门的五星红旗下半旗时，泪水又滚落了我的眼眶。

然而，不久……

当我们的小学生一次次向灾区捐款捐物时，他们的家长却面临失业的危险；当市场管理部门向我们的商户募捐和摊派时，在奥运会召开前夕，他们却面临闭市的问题，无功而返；当我们为了北京的大街小巷，爬上爬下栽花种柳，为了奥运工程不分寒暑加班加点时，奥运

会到家门口了，他们却要不声不响、蜷身而退；当我们为了父母，为了孩子，同时也是为了北京，建一些简易幼儿园，奥运会来了，他们却要四散分离……

太多的遗憾，太多的情绪和不满，我们不禁又要问：奥运会来了，我们怎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高兴不起来，为什么很多人说不如不搞，为什么有人要问：这是谁的奥运？

我自知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始终深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之所以在人们一片大声叫好声中发出不合时宜的声响，只是要告诉人们：爱，需要热情，爱，同时更需要冷静。

最后，衷心祝愿北京奥运会能圆满成功！

2008年7月7日

专题征文启事

最近一段时间《立场》在接收稿件的同时，陆陆续续地收到了一些热心读者的意见反馈。这些反馈对我们的工作而言，无疑是莫大的肯定和鼓励，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除此而外，在读者的来稿与来函中间，我们发现当下还有许许多多的教育问题以及与教育相关的问题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引发更深的思考。

我们把这些问题整理分类，并且以征文的形式提出来。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立场》这个传播媒介，把这些有价值的问题提升到公共讨论的层面，以引起更为广泛的重视，激发更为细致深入的对话与探讨。因此，从本期开始，《立场》特别针对以下四个不同的专题不定期征稿，我们热忱地期待着各位读者踊跃地加入到这些讨论中来。此外，我刊也继续欢迎大家来稿探讨教育和人文社会科学相关的其他话题。

（一）关于城乡教学成效的描述与分析

城乡教育不平衡早已成为公认的事实，引起了舆论和学界关于城乡教育财政、教师合格率、教材适应性和学校设施等多方面的讨论与研究。自2006年“两免一补”的政策在全国农村学校实施以来，农村孩子上学贵的问题已经大大缓解，教学质量和学习成效自然成为农村教育改革的焦点。然而，“能否学得好”是比“能否上学”复杂得多的问题，涉及到教育系统的每一个环节——教师培训、学校管理、课程安排、教学方法、家庭环境等。可是，我们目前并没有成熟、有效、系统的改革方案。无论是新教学方法还是新教材与课程的引入都应视为探索性措施，需要对教学质量进行细致深入的政策评估才能确定切实有效的方案。而要进行评估，必须跟踪政策实施前后儿童的学习成效，对其进行比较。

目前，我们更多的是笼统地讨论城乡教育质量差距，急于探求造成差距的原因，而对于城乡学生在学习成效上的具体差距所知甚少。例如，很多在农村的教师都体验过农村学生基础差的情况，但是乡村、县镇、和城市儿童进入小学一年级时在语文和数学基础知识上的差距究竟有多大？一年、两年、六年的学校学习之后，这些差距是加大了还是缩小了？加大了多少，缩小了多少？这些差距中间有多少可以归结为家庭教育跟不上，有多少是因为学校在资源、师资等方面的差异造成的？其他各年级、各学科亦可提出相应的问题。类似这样的描述，是对城乡教学状况最基础的把握，应该是农村教育改革思考的起点，也是评价教育政策是否有效的必须信息。遗憾的是，这似乎尚未引起广泛的重视，更没有进入公共讨论的视野之中。

《立场》杂志就此专题向广大家长、教师和教育研究者征稿，希望类似的教育教学细节问题能够引起学界和社会更广泛的重视。

（二）反思“减负”及其后果

长时期以来，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一直被作为“应试教育”体制中的痼疾，受到公众舆论和教育专家的谴责。在这种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中央以及地方的教育部门频频推出改革措施，以杜绝和限制此类问题的滋生和蔓延。例如，近年一些地方为了给学生“减负”，相继取消了中小学的期中、期末和小学升初中的考试，强制限定学生完成家庭作业的时间，以及禁止学校利用假期给学生补课等。

依靠行政力量制造出的“减负”声势，能够及时回应舆论要求，化解舆论压力。但是此类举措，也不同程度地削弱了我们对一些现实和细节性问题思考的愿望和能力。因为任何对教育的良好愿望（包括基于行政命令之上的诉求）都不能取代对这一问题的解决过程所做的细致观察、历史性分析以及由此得出的评判。“减负”同样如此。面对当下围绕“减负”的各类诉求，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追问的是：类似于取消学校对学生学业的考察、缩减完成家庭作业的时间的这些“减负”举措，在不同的教育现场是如何被理解和操作的，产生了一些什么后果？比如，它对学校整体的教学计划、每位教师的教学活动具体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影响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波及到每一位家长和学生中间？另外，与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和学校相比，那些教育质量较差的地区和学校，是如何平衡教学水平与“减负”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减负”对他们而言，包含了怎样的意思和内容？同样，从学生家庭的经济收入和拥有文化资本程度的差异来考虑，“减负”是否构成了多重意义，导致不同的家庭对这些教育举措作出不同的评判和选择？……类似这些细部问题还有很多很多，然而，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教育学界、社会和政策人士对此却知之甚少！

《立场》杂志从本期起长期向读者征募此类稿件。投稿者可以通过自身在现实工作、子女教育以及学校学习中遭遇到的各种“减负”问题，阐述思考和认识。在此我们特别期待那些常年在中小学从事教育工作的校长、教师以及学生家长和学生本人作为“事件当事人”给我们投稿。这里特别需要提醒投稿者注意的是，希望每一位来稿者在针对当下教育问题阐发观点时，尽可能回避一些主观情绪的宣泄和简单的道德评判，尽量结合工作和生活的实际体会思考“减负”给现实带来的正面或是负面的影响。只有暂时把“先见”“定论”搁置一边，努力回到描述和分析“现象”本身，我们才有可能内在地把握现实，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三）网吧、学生与学校

互联网兴起后，网吧在中国应运而生。虽然国家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规定中小校园周围 200 米内不得设立网吧，今天，中小城市和县乡一级学校周围有一两家网吧恐怕是难免的。学生因为上网缺钱或欠债而偷拿蛮抢也不鲜见。那么，学生去网吧，到底都做些什么呢？是不是都沉迷于网络游戏呢，还是也为了寻求知识？他们喜欢去网吧是因为网络社区的吸引力吗？网吧是否也是学生逃离枯燥学校生活的精神避难所呢？或许他们也能通过上网而获得仅靠周围环境难以支撑的精神成长？乡村网吧的兴旺与留守儿童的生活之间又有何种联系呢？学校对网络和网吧的态度、教师的言传与身教又如何呢？

我们欢迎针对网吧和当今学校教育与学生生活的相关问题的稿件，尤其欢迎有理有据、有分析有思考的经验研究与个案分析。

（四）NGO 在中国

近年来中国的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NGO）发展迅猛。在各个领域中都能看到非政府组织志愿者们活跃的身影。特别是在教育领域中，NGO 办的各种活动层出不穷：办图书馆、义务支教、培训教师、开办城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等等。这些组织的出现弥补了政府无法及时准确地提供公共物品的缺陷，也拉近了城乡之间的距离，提供了一个阶层互动的空间。

另一方面，正如《立场》本期杂志中关于梦想图书馆的调研报告所提到的那样，NGO 的工作开展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在最初的热情消退之后，公益组织要面对的是严峻的生存状态，同时更加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是：这些活动究竟如何才能持续下去？《立场》杂志希望借助我们的平台，展开对于教育公益组织的思考和讨论。

例如，NGO 的组织结构如何？内部管理采取什么样的模式？你所认识到的教育 NGO 都是怎么运行的？NGO 组织是如何自我学习以促进其理念、组织结构和项目的演进变化的？项目从最初的设想到具体实践以及事后的评估，这些流程是怎样的？和国外许多有经验的 NGO 不同，我们的 NGO 组织大都比较年轻，在项目设计的过程中会有何创新？同时，如何借鉴国外经验并实现其本地化以提高项目和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志愿者和组织者面临哪些困境？又是如何理解、分析、应对这些困境的？等等。

这些问题只是抛砖引玉。我们既期待大家来稿交流鲜活的个人体验，也欢迎严肃的理论思考。我们希望能够深入了解不同 NGO 发展、成长的故事；也希望通过 NGO 更进一步理解中国教育与社会的关系。

来稿请寄到info@lichang.org。我们期待着热烈、深入、细致的讨论！

《立场》编辑小组
2009 年 7 月

立场 - 教育对话

POSITIONS: Dialogues on Education

- i Preface
- 1 Breakthrough in Social Structure Do Not Happen Naturally:
Western Sunshine in Gansu Province
LIANG Xiaoyan
- 14 Ivory Tower and the Mud Walls (I):
Training Course at James Yen Rural Reconstruction Institute
PAN Jiaen
- 29 A Journal of A Volunteer Teacher in Western China (IV)
ZHOU Yisu
- 43 Beijing Olympics in My Eyes
Jing Hua Mi Ke
- 52 Call for Papers on Special Topics

Copyright:

Positions: Dialogues on Education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No Derivative Works 3.0 Unported License.



Editorial Team

LAI Lili, LIU Yu, LUO Jun, WANG Dan,
XU Jianping, ZHOU Yisu

Website

www.lichang.org

Contact Us

info@lichang.org